

摘要

公元 1 至 4 世纪是古罗马历史上文化交流最频繁、宗教活动最兴盛的时期，同时也是基督教由诞生走向广泛传播的时期。本文以这一时期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传播为研究对象，考察基督教在帝国东西部的不同传播状况，从产生初期在帝国东部地区的快速传播到之后自东部向西部地区的广泛蔓延，分析东西部地区传播的差异；同时，通过统治阶层从最初将基督教视为异端进行镇压，到后期随着它在帝国境内的广泛传播，统治阶级转为自上而下的扶持，宣布基督教为合法宗教的过程，来探讨统治阶层对基督教态度的前后变化及其深层次的原因，认为罗马帝国东西部地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等多方面的差异，这导致了基督教在帝国东西部地区的传播有所不同，同时也改变着统治阶层对其态度的演变，影响着帝国晚期之后基督教在帝国东西部地区不同的发展方向。

本文的正文部分共分五章，以时间顺序为轴，第一章首先概述罗马帝国早期的社会背景和特征，并通过解释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内在联系，引导出基督教自诞生以来就被冠以“异端”的原因。第二章由基督教在自东东部向西的传播，分析公元 2 世纪罗马统治者对早期基督教的态度，同时阐述在此期间基督教与犹太教之间内在联系的变化。第三章论述了基督教在“三世纪危机”不同阶段中，是如何面对罗马统治者复杂的宗教态度，又是如何通过完善自身组织结构，在帝国西部快速发展，并形成对罗马多神教的挑战。第四章分析了罗马统治者对基督教传播态度转变的原因，以此为线索，结合统治者实施的宗教政策，解释基督教的传播与其宗教地位变化之间的关联。第五章对基督教合法化及其国教化的过程和原因进行概述，探讨基督教成为国教对其自身和罗马帝国双方造成的影响。

本文以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东西部的不同传播为切入点，又以罗马统治者对基督教传播的态度变化为线索，结合公元 1 至 4 世纪罗马帝国的政治经济因素、社会背景和宗教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分析基督教由“异端”到“合法”这一转变的内在原因。以期帮助人们更全面地了解基督教的传播过程与罗马帝国的社会文化。

关键词：罗马帝国；基督教；宗教传播；宗教地位

Abstract

The 1st to 4th centuries AD was the period of the most frequent cultural exchanges and the most flourishing religious activities i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Rome, and it was also the period when Christianity was born and became widely spread.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spread of Christianity in the Roman Empire during this period, and examines the differences in the spread of Christianity i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parts of the empire, from its rapid spread in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empire at the beginning to its widespread spread from the east to the west afterwards; at the same time, it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in the spread of Christianity i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 through the ruling class's initial suppression of Christianity as a heresy to its top-down support as it spread widely in the empire.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the process of the ruling class' initial suppression of Christianity as a heresy to the later process of top-down support and declaration of Christianity as a legitimate religion as it spread widely within the empire, we explore the backward and forward changes in the ruling class' attitudes toward Christianity and its deep-seated reasons, arguing that the great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other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 of the Roman Empire formed during the long historical development, which led to the different spread of Christianity i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 of the empire and It also changed the evolution of the ruling class' attitude toward it and influenced the different directions of Christianity i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parts of the empire after the late imperial period.

The main text of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five chapters, with a chronological axis. The first chapter firstly Outlines the social background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arly Roman Empire, and explains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Judaism and Christianity, leading to the reason why Christianity has been called “heretical” sect since its birth. The second chapter, from the spread of Christianity from east to west, analyzes the attitude of Imperators to the early Christianity in the 2 century AD, and expounds the changes in the internal relations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Judaism during this period. The third chapter discusses how Christianity faced the complicated

religious attitude of Imperators in different phase of the “Crisis of the Third Century”, and how it developed rapidly in the western part of the Empire and formed a challenge to Roman polytheism by perfecting its own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The fourth chapter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the change of Imperators’ attitude towards the spread of Christianity, taking this as a clue and combining with the rulers’ religious policies to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pread of Christianity and the change of religious status. The fifth chapter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process and reasons for the legalization of Christianity and its state religion, and explores the impact of Christianity becoming a state religion on itself and on both sides of the Roman Empire.

This paper takes the different spread of Christianity i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parts of the Roman Empire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the changing attitudes of Imperators toward the spread of Christianity as a clue to analy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ristianity from “heresy” to “legitimacy”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actors, social background and religious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he Roman Empire in the 1st to 4th century AD. In order to help people understand more comprehensively the process of the spread of Christianity and the social culture of the Roman Empire.

Key Word: Roman Empire; Christianity; Religious communication; Religious status

目 录

摘 要	I
Abstract	II
绪 论	1
一、选题依据与研究意义	1
二、研究综述	3
三、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11
第一章 罗马帝国早期与基督教的诞生	12
第一节 帝国早期社会及其特征	12
第二节 公元 1 世纪基督教在帝国东部的诞生及其“异端”地位	19
第二章 “黄金时代”基督教的传播	25
第一节 基督教在帝国东部的迅速发展及向西传播	25
第二节 公元 2 世纪罗马统治者对基督教传播的态度	32
第三节 “日渐独立”——基督教与犹太教划清界线	35
第三章 “三世纪危机”时期基督教的发展	39
第一节 公元 3 世纪罗马统治者对基督教传播的态度	39
第二节 基督教在帝国西部的传播与教会组织的完善	45
第三节 “发起挑战”——基督教与罗马多神教的矛盾	51
第四章 罗马统治者的态度转变与基督教宗教地位的提升	55
第一节 罗马统治者对基督教传播的态度变化及原因	55
第二节 帝国东西部不同的基督教迫害政策对比	60
第三节 “走向合作”——基督教的宗教地位上升	68
第五章 基督教取得“合法”宗教地位与西罗马帝国的衰亡	71
第一节 君士坦丁一世的宗教政策与基督教会的合法化	71
第二节 “戴上桂冠”——基督教国教地位的确立	74
第三节 “阿卡西乌分裂”与罗马帝国的分裂	80
结 语	83
参考文献	84
致 谢	95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著）及科研情况	96

绪 论

一、选题依据与研究意义

(一) 选题依据

基督教诞生于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境内的巴勒斯坦地区，最初只是罗马帝国广阔疆域内众多宗教派别中的一支。但在随后的300年间，基督教信仰以惊人的速度传播至罗马帝国全境，并经历了一个由异端教派到取得合法宗教地位，再最终成为了罗马帝国国教的过程。然而，早期基督教的发展过程并非是一帆风顺的，事实上，早期基督教在最初的发展和传播过程中，时常受到了来自帝国多方势力的压迫和排挤，甚至还包括针对基督徒的大规模屠杀，这与其最终成为国教的结果形成了鲜明差异。若要探究形成这种质变的根本原因，则需要从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中的传播与罗马统治者对基督教传播的态度转变入手。

古罗马国家进入帝国时代后，统治的疆域极为广阔，根据不同地区的主流文化大致可以区分为，以拉丁语系为基础的罗马帝国西部和以希腊语系为基础的罗马帝国东部。基督教最早诞生于叙利亚-巴勒斯坦行省（Syria Palaestina）境内，此地区在罗马人入主前，长期由希腊化的塞琉古王国统治，因此该区域为希腊语系地区，属于罗马帝国东部。纵观基督教的发展，其经历了一个最初在帝国东部诞生，由东部向西部传播，并在帝国东西部形成相互关联却又大相径庭的发展道路。这种发展过程，与罗马帝国东西部截然不同的文化基础有一定的关联。

罗马帝国东部因地跨欧亚非三大洲，多民族间的文化交流频繁，又得益于受到古希腊文明高地的影响，在罗马帝国早期，东部行省较之西部行省不仅在思想文化领域更具优势，在人口密度、经济贸易等方面也处于领先地位。商业贸易的兴盛和文化的繁荣，为早期基督教在帝国东部的迅速传播提供了肥沃土壤，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东部行省由于多民族聚居的原因，各种思潮、宗教掺杂林立，这又成为基督教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公元135年，经历犹太战争后，哈德良皇帝彻底驱逐了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这为基督教与犹太教划清界线创造了良机。同时，罗马进入帝国时代后，开始与东方的帕提亚帝国角逐地中海东部的霸权地位，频繁的战争为西部行省带来了大量的奴隶，公元1至3世纪，是罗马帝国西

部行省，尤其是意大利地区日渐繁荣的阶段。这一时期从帝国东部流向西部的，除了源源不断的奴隶之外，还有各种来自东方的思想文化与宗教派系，基督教自然也包括在其中。正是这一时期，基督教开始在罗马帝国境内由东向西扩散传播。

但在经历“三世纪危机”后，罗马帝国西部诸行省由于奴隶制的衰败而陷入了全方面的萧条之中，东部地区却仍保持着较高的社会发展水平。这造成了罗马帝国的政治经济重心在公元3世纪晚期逐渐由西向东部偏移，基督教也在皇帝君士坦丁一世的扶持下在帝国东部建立起新的宗教中心——君士坦丁堡。公元313年，君士坦丁一世与李锡尼联合颁布了《米兰敕令》，使基督教获得了在罗马帝国境内的合法宗教地位，公元393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正式宣布基督教为罗马帝国国教。自此，基督教完成了由诞生到成为帝国国教的转变。基督教的传播过程，既是对早期教会兴起的真实写照，也是对罗马帝国由盛转衰的现实反映。

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学术界鲜见对早期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不同地区之间的传播进行深入探讨，因此，本文选取自奥古斯都创立元首制到罗马帝国分裂这一历史时期作为研究背景，以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东西部的不同传播作为研究对象，并结合罗马统治者对基督教传播的态度变化进行分析，力图总结出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境内迅速传播的原因，从新的视角解读早期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时期的宗教地位变化和基督教传播与罗马帝国国势兴衰之间的关联。

（二）选题意义

目前，国外关于早期基督教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且有相当数量的专著出版，但遗憾之处在于关注的焦点大多集中在基督教的兴起与罗马帝国衰亡之间的关系上，对基督教传播的路径及其宗教地位变化的研究仍有待加强。而且，大多数与基督教传播相关的专著研究对象较为单一，不仅未能对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不同地区的传播进行细分，更没有将基督教宗教地位的变化与罗马统治者的态度变化相结合。故而，研究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时期东西部传播与罗马统治者对基督教传播的态度变化有多重意义：

首先，近年来对古罗马时期的研究热点逐渐由传统的政治、军事领域转向社会、文化领域，宗教作为文化表现的一个载体，是研究古罗马时期社会、文化的重要一环。本文选取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时期的传播及宗教地位变化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考察基督教与该时期其他宗教的联系来分析罗马帝国时期的社会特征和文化传统，是对罗马帝国时期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研究的有力补充。

其次，由于国内对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会的研究视角相对集中，研究成果较之国外也更为薄弱，故而本文在汲取国内外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同时对古典文献中颇为零散的史料记载加以梳理，用不同的视角解读基督教的传播，以期补充国内关于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会的研究内容。

最后，本文的研究内容是对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相关领域的深化和扩展，可以说，通过研究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的传播，将有利于丰富古罗马历史研究，补充对早期基督教研究的内容，且有助于人们更好的理解和探析古罗马的社会和历史。

二、研究综述

（一）关于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东西部传播的研究

若要考察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东西部的不同传播状况，首先需要界定罗马帝国的东西部疆域及不同行省的分属。罗马帝国疆域广阔，因此可按照不同的文化类型区分为：以希腊语系为基础的罗马帝国东部行省和以拉丁语系为基础的罗马帝国西部行省。戴克里先统治时期将罗马帝国划分为101个行省，分属12个行政区。参考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时产生的分界线，在欧亚大陆板块，含达尔马提亚行省和潘诺尼亚行省在内的西部地区为罗马帝国西部，共7个行政区51个行省；含达契亚行省和米西亚行省在内的东部地区为罗马帝国东部，共5个行政区50个行省；北非则以阿非利加行省与克里特与昔兰尼加行省之间的边界为分界线。

由于罗马帝国东部行省的民族结构十分复杂，又长期受到古希腊文明的影响，故而多种思潮和教派林立。因此，基督教在东部地区的发展与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来自东方其他宗教的影响，而要研究这一时期基督教在东部行省的传播，则需要考察基督教与所谓东方“异教”，特别是与犹太教之间的关联。

恩格斯首先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对基督教的诞生直言不讳：“从普遍化了的东方神学，特别是犹太神学和庸俗化了的希腊哲

学，特别是斯多葛派哲学的混合中悄悄地产生”^①这说明，基督教的诞生，与犹太教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但它在脱胎于犹太教后，又融合了其他东方宗教的特征并自成一派。

道格拉斯·爱德华兹（Douglas R. Edwards）在他的《宗教与权力：希腊东部的异教徒、犹太人和基督徒》（*Religion and Power Pagans, Jews, and Christians in the Greek East*）中指出，早期基督教虽然已经从犹太教中脱离，却仍保留了浓厚的犹太教色彩，以至于罗马人最初并不能很好的区分两者。而且，早期基督教的传播依赖于布道者自身对教义的理解，再加上吸收了许多东方其他宗教派别的仪式和习俗，因此宗教思想比较混乱，这使得基督教在帝国东部的早期传播在形式和思想上都并非是统一的。但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基督教摆脱了犹太教相对保守的宗教传统，又凭借对东方其他宗教传播方式的吸纳学习，在帝国东部的底层民众中获得了相当广泛的受众，其影响范围涵盖到行省中的地方贵族，于是得以迅速扎根于帝国的东部行省。

研究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东部行省传播情况的著作，有伊莎贝拉·桑德维尔（Isabella Sandwell）的著作《古代晚期的宗教认同：安提阿的希腊人、犹太人和基督徒》（*Religious Identity in Late Antiquity Greeks, Jews and Christians in Antioch*）。该著以公元前后安提阿地区不同人种的宗教认同为主题，涉及区域包括了叙利亚、西里西亚、卡帕多西亚等数个东方行省。其中对“三世纪危机”过后帝国东部基督徒的教义理解和教会组织形式有细致的论述，特别是对基督教社区的建构进行了深度解析，由此可以对罗马帝国东部其他行省的基督教传播状况进行判断，也能够将其与西部行省的基督教社区进行对比分析，比较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东西部的传播差异。除希腊人、犹太人和基督徒外，著作中还描写了安提阿地区其他一些民族的宗教认同问题，对理解罗马帝国东部地区整体宗教环境具有良好的补充作用。

在关于基督教由帝国东部行省向西部传播这一问题上，比利时宗教学家弗兰兹·库蒙（Franz Cumont）的著作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他笔下的《罗马异教世界中的东方宗教》（*The Oriental Religions in Roman Paganism*）是研究罗马帝国东部神祇崇拜的一部重要作品。库蒙是最早对罗马帝国东部神祇崇拜进行研究的学

^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7-254页。

者之一，他详细的对罗马帝国时期出现在帝国东部的各种教派进行了介绍和归类，在对东方宗教的介绍中，不乏有关于东方宗教与早期基督教之间联系的描述。同时他还认为，东方的商人、奴隶，以及军队中的东方籍士兵是将东方崇拜引入帝国西部地区的重要媒介，基督教在自东向西的传播过程中，也采取了相同的方式。持同样观点的还有迈克·立普卡（Michael Lipka）的《罗马众神：希腊罗马世界的宗教》（*Roman Gods: Religions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该著作认为宗教传播与罗马的对外扩张是同步发展的，一些希腊和东方的神祇逐渐采用了罗马化的形式，通过出身东方的奴隶、商人或士兵等群体传播到罗马西部行省，基督教的传播也同样是利用这一方式。该著作还全面阐述了罗马国家的各种宗教崇拜，对罗马宗教的各种类型及其历史变迁进行了梳理，与《罗马异教世界中的东方宗教》形成互补，对理解早期基督教在帝国东部行省的发展过程中与其他东方宗教的关联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该著作也对早期罗马帝国存在的多种宗教并立现象有所记述，有助于了解其复杂的宗教环境。

而相较于文明程度较高的东部，罗马帝国的西部行省在罗马人展开对地中海世界的征服活动之前，长期处于蛮荒状态，尤其是如不列颠尼亚和西班牙等处于欧洲大陆边陲的行政区。因此基督教在由东部行省向罗马帝国西部的传播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帝国西部行省的“罗马化”进程，并与这些行省原住民的原始宗教产生剧烈碰撞。

作为本文的核心史料之一，邓肯·菲什威克（Duncan Fishwick）所著的《拉丁民族西部的帝国崇拜：罗马帝国西部行省统治者崇拜研究》（*The Imperial Cult in the Latin West: Studies in the Ruler Cult of the Western Provinces of the Roman Empire*）为研究罗马帝国西部的信仰情况提供了相当丰富的文献材料。此著作共分为4册，极其细致的描写了罗马帝国西部各行省自建立起不同时期的宗教信仰情况。第一册按时间顺序排列，从行省中的神庙祭坛、宗教政策、祭祀仪式等方面出发，论述了西部行省的原始宗教在基督教传播的信仰冲击下受到的影响，以及行省居民整体的信仰变化趋势。二、三册则深入行省宗教内部，对包括罗马多神教、基督教和其他异教在内的所有宗教团体展开描写，介绍了诸如祭祀团体，宗教集会，神像的制造、流通以及其产生的偶像崇拜等，对研究基督教在帝国西部行省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册中还涉及自奥古斯都时出现的帝王崇

拜现象，同时对各时期统治者的宗教政策和对不同宗教的态度也有大量篇幅的描写，对了解基督教向帝国西部传播的过程中受到的阻力有重要参考价值，也能由此判断基督教在自帝国东部向西传播过程中发生的宗教地位变化。

对帝国西部个别行省的基督教化研究中，古历史学家比德（Bede）的《英吉利教会史》是研究基督教进入不列颠行省最重要的史料，若要运用与该时期相关的书信、布道书等原始材料，则可以参阅《早期尼西亚的教父选集》（*The Ante-Nicene Fathers*）。T·罗伯特和S·布劳顿关于西班牙行省的研究《西班牙的罗马化：问题与证据》（*The Romanization of Spain: the problem and the Evidence*）对基督教在公元2世纪传入西班牙行省做出了详细论述，其中还讨论了基督教伴随“罗马化”一同对西班牙地区产生的影响。法国权威学者卡米尔·朱利安（Camille Jullian）的巨著《高卢史》（*Histoire de la Gaule*）是迄今为止研究高卢历史最具权威性的著作。该著作不仅对高卢行省进行了详细的考察，研究内容还包括日耳曼尼亚、雷蒂亚等多个日耳曼人生活的行省。作者结合了大量的古典文献和考古资料，对罗马帝国时代高卢地区的历史进行深入剖析，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由于这部著作涵盖了自罗马城建立至罗马帝国灭亡期间高卢地区的全部历史，因此其中关于基督教传入高卢地区后对日耳曼文化造成的影响非常具有参考价值，从中反映出基督教在除罗马人之外其他民族中的传播也给予了本文很大启发。

（二）关于罗马统治者对基督教的态度转变与基督教宗教地位变化的研究

罗马统治者对基督教传播的态度转变可以通过两个维度来理解，其一是不同统治者之间的态度变化，其二是同一统治者自身的态度变化。因此若要对罗马统治者的态度变化展开研究，首先需要按时间顺序在整体上对历代统治者的基本宗教态度进行梳理，其次再深入考察各个统治者自身的态度转变，选取典型案例做出分析。

原始史料记载可以直观的体现出罗马统治者的宗教态度变化，例如由生活在戴克里先至君士坦丁一世之间的古罗马历史学者埃利乌斯·斯巴提亚努斯、特莱贝利乌斯·波利奥等人共著的《罗马君王传》（*Historia Augusta*）和盖乌斯·苏

维托尼乌斯（Gaius Suetonius）所著的《罗马十二帝王传》（*The Twelve Caesars*）都通过人物传记的记载提供了重要的线索。《罗马十二帝王传》记载了从凯撒至图密善之间共12位罗马国家元首的人物生平，而且苏维托尼乌斯不仅记录了统治者在任期间的总要历史事迹，还刻意收集了不少帝王们的日常政治活动和私人生活，为揣摩罗马统治者的宗教态度提供了新的视角。不过该著作涵盖的罗马统治者范围处于基督教诞生初期，可用的资料较为有限。另一本《罗马君王传》则以安敦尼王朝的哈德良皇帝为起点，一直记载到“三世纪危机”期间的诸位僭主，在时间上与《罗马十二帝王传》恰好形成互补关系。《罗马君王传》的记载年代跨度长，包含的罗马统治者数量众多，内容也十分详实，每位统治者都尽可能的介绍了其出身和成长经历，使读者对君王有更加立体的认识。由于该传记以时间顺序进行排列，为比较统治者互相之间的宗教态度变化提供了便利。书中除了对各个统治者处理与基督教关系的表现进行了描写，还对其他宗教和罗马多神教的态度也有记录，为本文写作提供了大量参考。但《罗马君王传》的成书年代距今过于久远，不少史料已无从考证，其中也不乏已被现代学者证伪的记载，况且其最后几章关于“三世纪危机”期间罗马统治者的记载现已失传，需要借助其他材料加以补充和校对才能使用。

除人物传记外，由小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与图拉真皇帝之间的《书信集》（*Letters and Panegyricus*）、安布罗斯（Ambrose Saint）与瓦伦提尼安皇帝之间的书信（*The Letters of S. Ambrose*）都是罗马皇帝对待基督教的态度最直接的记录。尤其是小普林尼的《书信集》，不但现今仍保存完整，且其中的大量内容直接涉及罗马官方如何处理与基督教的关系，可以很好地理解罗马统治者对早期基督教传播的看法。

近现代学者中，约翰·弗格森（John Ferguson）在《罗马帝国中的宗教》（*The Religions of the Roman Empire*）中指出，基督教及其他东方崇拜在罗马帝国快速传播得益于罗马统治者长期实施相对开放的宗教政策，宗教信仰的灵活性同时也是帝国宗教政策的突出特征。由此可以做出判断，在针对基督教的大规模迫害事件发生之前，基督教信仰受到罗马统治者有意或无意的宽容对待，才得以在帝国内快速传播，这就表明了罗马统治者起初对早期基督教的态度与帝国中的其他教派并没有很大区别。

而埃兰·霍伊 (Ian Hoey) 在文章《罗马军队关于东方崇拜的官方政策》 (*Official Policy toward Oriental Cults in the Roman Army*) 中又指出, 军官和士兵只有在保证对罗马传统诸神和皇帝献祭的前提下, 才被允许向东方神祇献祭。这一观点与亚瑟·詹姆斯·梅森 (Arthur James Mason) 在《戴克里先的迫害》 (*The Persecution of Diocletian*) 中分析戴克里先严格控制军队信仰的看法相一致。梅森的著作还对戴克里先发动“大迫害”的政治和宗教背景、动机、颁布的敕令以及执行的细节进行了深入描写, 对研究公元 3 世纪末 4 世纪初罗马统治者对基督教态度变化起到了极大的补充作用。

基督教宗教地位的变化, 实际上是基督教由“异端”走向“合法”的变化, 也即是基督教由一支东方教派成为罗马帝国国教的变化。在古典文献中, 通史类的资料以凯撒利亚主教优西比乌 (Eusebius of Caesarea) 著的《教会史》 (*Church History*) 最为细致。《教会史》记载了基督教自诞生至君士坦丁一世统治时期的发展历程, 书中包含大量的文献资料以及作者本人的亲身经历, 对基督教时如何从帝国东部一隅的支流教派发展到大帝国国教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另一种较特殊的文献材料是“圣徒传记”。这种传记类题材的开创者是公元 3 世纪末基督教信仰的维护者阿塔那修斯 (Athanasius), 著有《圣安东尼传》 (*The Life of Anthony*), 并以简洁的文笔, 通过圣徒安东尼的视角, 描写随着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后, 帝国各阶层对基督教信仰的看法。这部著作以及后世仿效其创作的诸多圣徒传记类作品, 以英雄史诗的方式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史料, 在某些特定的时期, 其重要性绝不亚于历史作品本身。^①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 学者们开始用一种历史的、批判的方法把基督教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这一时代背景之下, 恩格斯对早期基督教历史进行了系统梳理和论述, 其成果主要体现在收录于《马恩全集》的三篇文章中, 分别为《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启示录》和《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恩格斯用唯物史观, 以早期基督教的诞生和取得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 去阐述其宗教地位变化的原因, 为后来者研究基督教的宗教地位变化提供了新的观点和理论依据。

20 世纪初被誉为“教会史权威”的阿道夫·冯·哈纳克 (Adolf Von Harnack) 不仅首先将人口统计学方法应用于研究早期基督教的历史, 他还把基督教在罗马

^① 乔治·奥斯特洛格斯基:《拜占庭帝国》, 陈志强译,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19 页。

帝国兴起的原因归结为早期基督教在文化上的“融合主义”和信仰上的“简易化”主张，即由于早期基督教对同时代其他宗教以及哲学因素的融合和发展，促使其在文化和政治上同质的罗马帝国迅速发展；并且相比较其母胎犹太教而言，无论从信仰的角度还是宗教仪式上，早期基督教所做的简易化的主张都促使其信仰在罗马帝国得以快速传播。这一理论在哈纳克的著作《基督教在最初300年中的传播和发展》（*The Mission and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 in First Three Centuries*）中进行了详细论证，也给予本文研究基督教宗教地位变化新的视角。

综上所述，目前国外学者对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传播以及罗马统治者对基督教态度转变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基督教在帝国东西部不同的传播方式、统治者宗教态度转变的原因及影响、导致基督教宗教地位发生变化的主要推动力等，以上都为本文写作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本人力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历史史实的把握和梳理，在相关领域做出自己的审视和思考。

（三）国内研究现状

相较于国外，国内有关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传播与宗教地位变化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尤其是细致到对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不同行省的传播情况的研究专著较少，不过随着古典学在国内兴起，该领域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化，并且已有部分文章发表。相较而言，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的传播与宗教地位变化问题在国内仍有较大研究空间，特别以罗马统治对基督教态度的转变为视角的研究上，仍然鲜有学者涉及。

随着古典文明研究在国内的兴起，中国学者在大量翻译国外著作后，发表了一系列具有中国视角的学术成果。首先在专著方面，由池凤桐所著的《基督信仰的起源》，是国内较早研究基督教的学术专著。该专著在对早期基督教兴起过程的研究中，不仅谈论了基督教与犹太教之间的关系，还对基督教在诸如埃及等地的传播情况做出了简要描写。并且，书中还整理了部分非基督徒的文献史料，对于国内最早一批研究基督教的学术著作而言十分难得。赵林的《西方宗教文化》中，开篇便着重论述了罗马宗教受到希腊古典文化的影响，并被逐渐希腊化的过程。之后则以基督教为立足点，阐述了基督教与罗马帝国、犹太教和希腊哲学之间的关联。书中除了对基督教与帝国本土宗教的碰撞与融合做出详尽的论述外，

还描写了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东部行省长期受到希腊文化影响下的传播状况，这为本文了解基督教在帝国东部的传播情况提供了重要论据。

国内相关领域的论文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兴起，较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是李永斌的《罗马帝国早期宗教政策与基督教的发展》，文章中分别讨论了罗马帝国的一般性宗教政策、针对早期基督教传播的政策以及基督教在该政策影响下的发展状况，文章特别强调了帝国宗教政策在基督教由一个小支派成长为帝国国教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其中涉及宗教迫害政策和罗马统治阶层对基督教的态度转变，是值得本文借鉴的内容。颜昌友的《关于早期基督教的历史分期问题》则将基督教从产生到尼西亚宗教会议的召开作为基督教发展的几个划分阶段，具体可分为“自发”、“自发向人为过渡”和“人为”三个阶段。文章认为，在成为国教后，罗马帝国与基督教之间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结盟的关系，这一观点为研究基督教的宗教地位变化与罗马帝国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可行的视角，持同样观点的还有刘爱兰的《从民族宗教到帝国宗教——基督教的产生与发展历程》。

至本世纪，国内关于早期基督教地位变化问题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呈现百花齐放的态势，不仅在研究对象上更加丰富，在研究方法和一手史料的运用上也有了较大的更新。其中，对基督教与其他“异教”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罗马帝国实施过的宗教迫害政策等方面出现了不少值得参考的文章。袁波的《基督教的传播与罗马帝国统治者的因应对策》运用了大量国外学术成果，详细论述了宗教迫害政策在基督教传播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并对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取得合法地位进行了合理的论证。文章中引用的不少古典文献原文内容，经由作者翻译，为其他学者继续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上海师范大学的焦汉丰在其硕士学位论文《古代晚期的宗教暴力、殉道与政治合法性》中，对罗马帝国时期各类宗教间产生的暴力与相互迫害行为做出了描述，所选角度十分新颖。文章中对基督教殉道行为的阐述尤为细致，通过剖析基督徒殉道者的被害者形象，既有助于了解基督教传播过程中对皈依者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也为了解罗马帝国时期的宗教迫害政策提供了新的视角。

总的来说，虽然国内外学者对早期基督教的传播与宗教地位变化问题已做出了一定深度的研究，但这一领域仍有许多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内容，而且对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时期东西部的不同传播始终罕有人涉及。因此，本人力图在前人研究

的基础上，以罗马统治者对基督教的态度转变为切入点，通过对史料的把握和梳理，尽可能的阐述基督教由“异端”走向“合法”的转变过程。

三、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一）研究内容

本文将以前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的传播和罗马统治者对基督教传播的态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将基督教在帝国东西部的不同传播状况作为线索，重点关注基督教在传播过程中受到罗马统治者态度转变的影响，以及在这种影响下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中的宗教地位变化，从而形成对早期基督教兴起缘由更为的立体认识，最后以基督教宗教地位变化引导出罗马帝国的盛衰，理解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二）创新之处

本文试图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创新：

第一，从选题视角来说，通过对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东西部的传播与罗马统治者宗教态度的转变，分析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的宗教地位变化。由于有关基督教传播的古典文献记载较为零散，本文基于文献对基督教的传播进行综合梳理。通过考察不同时期罗马帝国的宗教政策，对罗马统治者的宗教态度进行剖析，从而研究基督教势力兴起与罗马帝国统治者态度变化之间的内在联系。

第二，从观点上看，本文以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东西部的不同传播为切入点，论证基督教宗教地位变化的过程，并与罗马统治者的宗教态度相结合，理解基督教从异端教派发展成为国教的根本原因。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利用历史学的分析方法与跨学科研究相结合，并对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东西部的传播进行了比较研究。本文首先通过社会学研究成果，探究罗马帝国时期的社会文化和宗教环境，又借鉴了宗教学理论，用以解释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中传播的独特性。从而全面理解基督教是如何由一个“异端”教派，最终取得“合法”传教地位，并进一步成为帝国国教的内外因所在。

第一章 罗马帝国早期与基督教的诞生

罗马帝国早期，由屋大维·奥古斯都的统治为起点，至公元 192 年康茂德被弑为止，包括朱里亚·克劳狄王朝、弗拉维王朝和安敦尼王朝三个王朝在内。帝国早期既是罗马国家由共和制向帝制过渡的转型阶段，也是罗马国力上升的繁荣时期。公元前 27 年，盖乌斯·屋大维（Gaius Octavius）获得元老院授予的“奥古斯都”（Augustus）称号，此时的罗马国家虽在名义上仍保留了共和制时期的部分传统，实则由“元首”实施个人军事独裁进行统治，元首制的建立，象征着罗马开始步入崭新的时代——罗马帝国时代。从屋大维·奥古斯都至尼禄（Nero）的统治时期，被称为朱里亚·克劳狄王朝（Julio-Claudian dynasty），该时期的罗马国家已建立了集权专制统治，不过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层面仍保留了诸多共和时代的残余，因此形成了许多该时期独特的社会特征。

第一节 帝国早期社会及其特征

一、元首制下的新式罗马国家

“在公元前 27 年举行的一次元老会议上，他卸下了自己身上的特殊权力，并宣布重新恢复罗马古老的体制。但是，就在这次会议上，元老院坚持认为，屋大维应该接受许多新的权力... 这些权力巩固了它元老院首领和第一公或元首的地位。自此开始，罗马政府的新形式诞生了，罗马人称之为‘元首制’”^①屋大维·奥古斯都通过元首制，巧妙地在表面上保留了共和国时期的各种政治机构和官职，实则将包括军队部署及调度、行省税收和官员任命、宗教祭祀在内的一系列国家权力置于他个人的掌控中，奥古斯都也理所当然的成为了罗马帝国实际上的统治者。或许在屋大维离世的百年之后，仍能够从诸如塔西佗等当代历史学家的记载中，看出他们对共和制度的追忆与缅怀，并对帝国政体下的种种集权形式颇有微词，但罗马已被名为元首制的车轮，载入了帝国时代的轨迹之中。

屋大维的施政举措为罗马帝国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军事上，他建立了常备军以取代公民兵，精简军团的编制，固定军团的番号和驻地，便于守备疆土以及对外战争；在政治上，他改组了元老院，将自己列为首席元老（Princeps

^① M·罗斯托夫采夫：《罗马》，邹芝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4 年版，第 135 页。

Senatus），同时，还创立了名为“御前会议”（Concilium Princepium）的管理机构，该机构与元老院的决议具有同等效力，这无异于变相削弱了元老院的行政权力；在财政上，通过对行省制的改革，屋大维规范了行省的包税制度，将皇室行省的税收控制在统治者麾下，并扶持骑士阶层作为皇室敛财的工具，既能够充实统治者的私人财产，又便于利用私产摄取更多的国家权力。

除了上述较直观的改革外，屋大维对罗马社会文化方面的影响，并不亚于政治经济领域，其影响甚至涉及到罗马人的精神世界和道德观念。屋大维的施政措施对罗马社会文化产生的影响，于两个方面可见一斑，其一是帝王崇拜的形成，其二是道德法令的颁布。

二、罗马多神教式微与帝王崇拜的诞生

作为古罗马文化中的重要一环，罗马的国家宗教，又称罗马多神教，是一种由自然崇拜发展而来的古老信仰传统。由于缺乏系统的教义，罗马多神教在其发展过程中大量接纳了来自其他民族的神祇。从演进轨迹中可以看出，罗马的神谱和宗教体系是一个动态的发展中的系统，其边缘不断延展，从一个单一的城邦神，扩展到多个城邦神的联合，特别是在与希腊文化的交汇中，形成为实际上是希腊、罗马一体化的宗教形式。

除了深受古希腊神话传说的影响，罗马多神教的演变还与罗马人的征服活动有着密切联系。自公元前3世纪起，罗马人在地中海世界展开了一系列征服活动，使罗马的国家版图大幅扩张，而征服活动在开疆拓土的同时，也把各种不同的民族纳入罗马人的统治范围之内。对被征服的民族而言，罗马运用军事暴力和专制机构彻底瓦解了传统社会的这种内部组织，使人们失去了他们早已习惯了的社会生活模式。^①传统社会组织发生的剧烈变化，破坏了被征服民族原有的生产关系，而在共和国时期，罗马又奉行严苛的公民权赋予政策，使得被征服民族长期处于较低下的政治经济地位。与此同时，传统社会组织的瓦解还造成被征服民族原始信仰的丧失，这些民族在精神世界上也陷入了空虚之中。罗马多神教在吸收被征服民族的宗教传统和祭祀仪式后，成为了弥补罗马人与其他民族之间间隙的关键所在。

^① 李永斌：《论基督教的产生——以罗马帝国社会背景为视角》，硕士学位论文，曲阜师范大学，2007年。

在传统的罗马人看来，他们的古老宗教并非是个人的精神信仰，而是一种他们所恪守的古老传统，也就是祖先的传统（*mos maiorum*），这对于罗马人的身份认同至关重要。^①因此，罗马多神教通过大量接纳来自被征服民族的神祇与宗教仪式，为松散的国家体制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凝聚力。广泛吸收其他民族的神祇与宗教仪式以维系社会稳定，既是罗马人宗教思想中包容性的体现，也反映了罗马多神教极强的功利性与实用主义，如黑格尔所说：“罗马宗教主要特征乃是对于若干自动的愿望所做的固执枯燥的冥想，他们认为这些愿望是绝对的存在于他们的神明之身，他们要求这被赋有绝对权力的神明能使这些愿望一一实现。他们便是为了这样的目的而崇拜神，为了罗马人的目的，他们就在一种有约束有限制的方式下从属于他们的神明。可见罗马宗教乃一种全然平凡的宗教，充满了狭隘的冀求，权宜之计，利益之图。”^②这种说法或许过于绝对，较之其他宗教，罗马多神教也确实更重视仪式而非教义，但在共和时期，罗马人的虔诚是不容置疑的。“我们的共和国之所以能像今天这样伟大，完全是因为我们竭尽全力取悦于不朽的神祇的缘故。”^③这说明多神教在罗马人的社会生活中始终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然而，共和国末期频繁的内战破坏了罗马多神教原有的功能性。内战加剧了罗马传统宗教中的功利因素，野心家为了政治目的肆意操控祭祀仪式，只为寻求神性的帮助来赢得民众的支持。

即使内战得到了平息，罗马多神教却早已沦为政治家用于证明独裁统治合法性的工具和手段。当功利性因素压倒了宗教本身的社会性功能，多神教自然而然地就会失去民众的虔诚，也就意味着罗马多神教开始走向衰落。此外，大帝国的建立，还意味着罗马多神教不再仅仅服务于意大利狭小城邦的自治事务，而需要适应罗马帝国的社会与政治发展。但原本用于维系社会稳定的罗马多神教此时却只剩下大量毫无实际意义又繁琐复杂的祭祀，例如，西塞罗曾记载到，古老的女神 *Furrina*，在他生活的年代中这一神祇的特性与功能已被遗忘，完全依赖于祭祀的猜测，但与该神祇相关的节日庆典（*FurrinaLia*）仍在每年的7月25日照常举行。^④多神教混乱的原始教义无法与大帝国政治上的统一相匹配，繁琐的祭祀

^① 焦汉丰：《古代晚期异教的衰微探迹》，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17年。

^②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464页。

^③ [古罗马]西塞罗：《论神性》，石敏敏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72页。

^④ Paul Harvey: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Classical Literatur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2, p.181.

仪式已变成了致命的缺陷，而且这种缺陷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被逐步放大，多神教陷入衰落之中也就在所难免。

出于维护社会秩序、鼓舞国民士气和提高公民凝聚力的目的，屋大维在罗马帝国早期仍曾试图挽救逐渐衰落的罗马多神教，他在成为奥古斯都后开始竭尽所能的复苏古老的宗教传统。他恢复了一些古老的祭祀仪式，不少神祇的祭司团也得以重新组建，他还重建了因内战而被毁掉的神庙。据统计，奥古斯都在位期间，仅罗马一地就重建和增建了82座神庙，显示了自己对古代罗马宗教的虔诚。^①

但一味地仿效古制并不能逆转罗马多神教的颓势，屋大维还需要为罗马多神教注入其他活力，“帝王崇拜”（Imperial cult）无疑是一剂强心剂。罗马的王权崇拜始于苏拉独裁，他当时被视为神之骄子。^②到凯撒掌权时期，对统治者的崇拜现象逐渐加强，甚至被视为罗马人爱国主义的体现。屋大维建立元首制后，一方面通过元老院赋予其终身执政官的权力，确认了元首政体的合法性；另一方面，通过将帝王提升到与神明相等的地位，实现帝王形象的神格化，从民众的精神世界中获取对个人专制的支持。事实上，“奥古斯都”这一尊称本身便有“神圣伟大”的意思，屋大维获得这一称号的同时，也为自身的统治披上了神性的外衣。

在奥都斯都统治时期，帝王崇拜随着罗马帝国疆域的蔓延到整个地中海世界，在东方，人们相信奥古斯都是神的化身这种思想很快就传播开来，他的塑像摆放在长期被东方人崇拜的“罗玛”女神一侧。在意大利，以及居住在各行省的罗马公民很自然地就在自己家里以及社团中将奥古斯都当成格尼乌斯家长神来崇拜。到最后，连一些罗马化的行省，诸如西班牙、高卢以及阿非利加行省也视奥古斯都为自己的家长神。^③屋大维死后，甚至被元老院列入诸神的行列，成为祭祀的对象。“我们可以举出那座祭 Gens Augusta（奥古斯都氏）的神坛作为许多纪念物中的一个例子，它是在迦太基地方一个罗马公民修建的一座私人祠堂里发现的。这座神坛大概是模仿罗马城中一座相似的纪念物的复制品。神坛上有一副雕像刻的是伟大的罗马女神……她的右手伸直着，捧住一根柱子，柱子上面挂着一面

^① [苏联]谢·亚·托卡列夫：《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魏庆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96页。

^② [苏联]谢·亚·托卡列夫：《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魏庆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95页。

^③ [美]M·罗斯托夫采夫：《罗马》，邹芝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4年版，第152页。

圆形的 *clipeus* (盾)，这面盾是元老院和人民献给奥古斯都、装饰在帕拉丘姆山上奥古斯都的住宅中的... 在女神的面前，可以看到一个祭坛，上面放着一支很大的 *cornucopiae* (富饶角)，角上挂着一根 *caduceus* (和平标)，在这两件东西的前面有一个球——那就是 *orbis terrarum* (地球)”^①显然，当时罗马人对屋大维的崇拜已与神明无异，正如凯撒的独裁统治模式为诸多后继者所效仿一样，奥古斯都时期形成的帝王崇拜现象，同样被罗马帝国后世的君王们极力推崇。

帝王崇拜确实为多神教提供了一定的活力，但这终究只是政治制度演进的产物，甚至帝王崇拜本身就是一种对固定对象的祭祀仪式而非具有信仰核心的宗教思想，这就决定了其并不能解决罗马多神教衰落的根本症结。诚如恩格斯所言：“古代一切宗教都是自发的部落宗教和后来的民族宗教，它们从各民族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中产生，并和它们一起成长，宗教的这些基础一旦遭到破坏，沿袭的社会形式、继承的政治结构和民族独立一旦遭到毁灭，那么与之相适应的宗教自然也就崩溃。”^②罗马多神教在罗马共和制时期能够成为国民的普遍信仰，是由于其迎合了公民政治下罗马国家的思想意识形态和多民族聚居形成的特殊社会状况，一旦这种基础遭到帝制的侵蚀，混乱的教义和刻板的仪式自然无法继续满足帝国公民的精神需求。帝王崇拜试图利用神化统治者的方式引导民众重新回归到罗马传统宗教之中，对不同民族的精神世界起到整合效果，但从历史发展的历程中看，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除此之外，帝王崇拜还挤压了多神教中以家庭宗教为主的民间信仰的生存空间，迫使普通民众逐渐摒弃了对诸如家神在内的崇拜。在罗马共和早期，每家每户都会设立一个小神龛，叫“*Lararium*”（家神的神龛），每天早上都会摆放一些贡品，献给家庭守护神和家财神（*Penates*）。^③而到了国家转型时期，人们的宗教观念已经淡薄，敬神祭祀，已由虔诚信奉变为一种负担，家长渐渐不再亲自主持，而是交给家属，甚至是奴隶去做。^④帝王崇拜实际上削弱了传统信仰的多样性，打击了民众对多神教的宗教热情，对缓解多神教的衰落而言，无异于饮鸩止渴。

^① Michael Ivanovitch Rostovtzef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89.

^② [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27-336页。

^③ Roy Adkins, Lesley Adkins: *Handbook to life in Ancient Rom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244.

^④ 邹芝：《古罗马家庭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09年。

罗马多神教的衰落，使上层贵族和知识分子被迫投入东方哲学流派——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葛主义——的怀抱，以来填补精神世界的空缺，而下层平民则只能试图从东方的神秘主义中寻求一丝慰藉。但无论是哲学流派还是其他东方异教，都不足以完全弥补罗马帝国精神世界的信仰缺失，大帝国仍然急需更具有效力的精神指引。

三、帝国早期的社会危机与奥古斯都的道德立法

公元前1世纪时，罗马已经基本上征服了整个地中海世界，从建国初期台伯河畔的一隅城邦发展到地跨三大洲的庞大帝国。除过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外，罗马公民所展现出种种优良的道德品质也是促使其成功的重要因素。古罗马人始终坚信罗马崛起的重要原因是“他们的公民都具有美德，优秀的制度反过来培养了最优秀的公民，这些公民中的最优秀者，又大多富有节制，节俭，守法，爱国等众多的美德。”^①但在展开征服活动的同时，罗马国家同时也面临着严重的社会问题，最显著的一点，就是传统道德观念的滑坡。早在公元前1世纪，罗马著作家瓦罗就曾因罗马人对农业生产的态度变化而哀叹到：“现在所有的家长们都不沾镰刀和犁，而是躲在城市里，宁愿活动于剧场和跑马地之中，却不愿去照管谷物和葡萄园”^②

进入到罗马帝国时期，政治制度、社会道德、生活方式发生的巨大变化进一步加剧了传统道德的沦丧，传统道德曾具备的社会调节能力已彻底失效，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价值观扭曲和信仰迷失。导致罗马社会道德沦丧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根本的，是由于奴隶制的迅猛发展造成的阶级矛盾。征服战争给罗马带来了大量的廉价奴隶劳动力，从而使大规模的使用奴隶作为主要劳动力成为可能。罗马帝国时期的常备军制使罗马公民需要长期服役，遂逐渐远离了稼穡农耕的小农生活，以奴隶劳动取代自由劳动的趋势已成必然。“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③，到帝国时代早期，处于高速发展状态的奴隶制将罗马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矛盾提高到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地位，同时，奴隶制还导致贫富差距悬殊、土地兼并严重、阶级矛盾激化、被释奴身份认同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

^① 晏绍祥：《古典民主与共和传统》（上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2-233页。

^② [古罗马] M.T.瓦罗：《论农业》，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33页。

^③ [苏联]列宁：《列宁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74页。

都成为罗马道德秩序崩溃的重要诱因。

“在古代各民族那里出现的奢侈品生产，是奴隶制关系的必然结果。古代国家灭亡的标志不是生产过剩，而是达到骇人听闻和荒诞无稽程度的消费过度 and 疯狂的消费。”^①道德危机首先表现在上层社会生活风气的败坏，罗马贵族阶层在对外征服和内战的过程中，利用政治站队和战争承包商等手段敛取了大量财富。特别是罗马骑士阶层，作为屋大维政治改革中最大的受益者之一，有权出任帝国新设立的所有高级官职，由曾经的金融贵族蜕变为官僚贵族，而其庞大的财富成为了挥霍的资本。从那不勒斯海岸到吐库卢姆的乡间，布满了贵族们的别墅，他们挥金如土，不惜耗费巨资从希腊收购雕塑予以装饰这些别墅，养鸟室、猎场和鱼池等享乐设施在其庄园中应有尽有。奢靡之风很快便蔓延至了社会中下层，一部分自由民在土地兼并的过程中失去了份地，脱离生产后进入城市中成为了依赖施舍和救济的寄生阶级。他们不仅沉迷于竞技场表演和各种庆典活动，还视农业生产为一种卑贱的工作，认为生产是奴隶才应从事的活动。道德崩溃甚至影响到了军队，在加利卡努斯的记载中，受希腊之风影响的士兵军纪涣散到令人发指的程度，“被奢靡的作风和达菲尼的风气给败坏的叙利亚军团...他们完全用热水洗澡。”^②

同样是出于维护统治和重建公共秩序的目的，奥古斯都试图通过法律手段，针对各种道德问题颁布相应的法令，整改奢靡败坏的社会风气。根据苏维托尼乌斯的记载^③，公元前18年，屋大维通过了限制餐饮开销的《尤利亚法》和《关于选举舞弊的尤利亚法》，用以整顿出现在宴会和活动上的铺张浪费现象。两部抑奢法相互关联，以餐饮方面的奢侈问题作为切入点，宣扬勤俭自律的道德风习，更深层的目的是在于防范官职竞选者利用宴请来炫耀个人财富和地位、特别是借此拉拢选民进行贿选。此外，屋大维于公元前22年通过法律，禁止元老阶层及他们的子嗣直接参与到舞台表演中。^④公元19年，屋大维的养子提比略(Tiberius)

^① [德]卡尔·马克思、[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四十六卷（上），2016年版，第424页。

^② [古罗马]埃利乌斯·斯巴提亚努斯等：《罗马君王传》，谢品巍译，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07页。

^③ [古罗马]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张竹明、王乃新、蒋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86页。

^④ Cassius Dio, *Roman History, Volume VI, Books 51-55*, translated by Earnest Cary, Herbert B. Foster,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7, p.54.

再次通过元老院决议，禁止元老阶层参与角斗士表演。^①通过法律来禁止社会上层人士直接参与公共竞技或是娱乐表演，是由于戏剧、歌舞和角斗等娱乐表演活动大多来自希腊或是东方世界，这被罗马人视为道德风气腐化的表现，罗马人也认为正是这些萎靡腐朽的风气导致了希腊的最终衰亡。

而道德立法在实际执行的进程中，遭遇了不小的阻力，有来自公民的刻意规避、法律条文本身含糊不清、司法程序受阻等各种因素的干扰，最终导致法令效果不尽如人意，对纠正社会道德风习的作用也相当有限。虽然在政治道德领域，立法收获了一定的成效，但古罗马国家在社会转型时期所经历的社会危机，在本质上是当时社会经济巨大变革的结果，道德立法仅从道德和法律层面入手，不可能解决社会的根本矛盾，自然也无法从根源上阻止传统道德的崩坏。

现世的道德问题愈发严重，罗马人对传统的追忆就愈发强烈，面对道德领域的真空，西塞罗大声疾呼：恩尼乌斯称之为罗马国家存在之根的古老风习而今留存些什么结果？^②罗马转型时期这种对共和时期乃至王政时期社会风气的普遍追忆，为传统信仰的回归创造了可能性。但与传统道德一样面临着衰落的多神信仰，显然无法承担起罗马精神世界救世主的角色，这就为东方的各类思潮和教派介入提供了机会。

第二节 公元1世纪基督教在帝国东部的诞生及其“异端”地位

屋大维入主罗马后，随着新政体的施行和内战的结束，地中海世界迎来了久违的和平。屋大维逐渐停止了对外扩张的步伐，转而稳固已有的疆域，这一方面导致处于高速发展中的奴隶制经济失去了稳定的奴隶来源，另一方面却又促进了帝国内部各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与文化交互。同时，出于信仰危机所造成的影响，来自东方世界的各种哲学思潮和宗教派别开始由帝国东部地区向西传播，形成了罗马帝国时期独特的宗教并立现象。基督教，正是在这一时期从犹太教中脱离后自成一派，首次进入到罗马人的视野中。本节将讨论基督教是如何在罗马帝国东部诞生以及其诞生之初在帝国的宗教地位。

^① Barbara Levick, *The Senatus Consultum from Larinum*,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1983.

^② R. H. 巴洛：《罗马人》，黄韬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9页。

一、基督教的诞生及其与犹太教的渊源

虽然学界对基督教诞生的具体时间和情况尚存在争议,不过根据现有的历史资料进行考据,基本可以认定,基督教应诞生于在公元1世纪上半叶罗马帝国境内的巴勒斯坦地区,曾属于犹太教的一个分支教派。

基督教(Christianismos)一词最早见于公元2世纪初伊格纳提乌斯(Ignatius)的《致马格尼西亚教会书》(*Epistle to the Magnesians*)中。不过在此之前,叙利亚的安条克城就已有入称呼追随耶稣基督的人为基督徒。而参考公元1世纪时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弗斯(Josephus)的记载,公元62年,犹太教大祭司处死了“被称为基督的耶稣之弟雅各,和某些他的同伴。”^①但鉴于《犹太古事记》在公元4世纪曾遭到教会的篡改,该段记载的可信度至今仍然存疑。^②根据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的描述,虽然最早对基督徒公开进行迫害的是罗马统治者是尼禄,但事实上早在提比略统治时期,就已存在与基督教的相关记载,“那个使他们有基督徒之称的人,基督,已在提比略时期,为总督彼拉多所杀。”^③

公元3世纪的古教会史学家优西比乌认为,虽然基督徒在他生活的年代中仍被视作罗马帝国中的新群体,但基督教的历史因基督徒特有的生活方式和敬虔原则,而应被定位于更早的时间点。受到约瑟夫斯和斐洛(Philo)的影响,优西比乌在其著作《教会史》中将基督教的产生与耶稣的诞生划上等号:“奥古斯都在位的第42年,即埃及托勒密王朝被征服后,安东尼(Antony)和克娄巴特拉(Cleopatra)离开人世的第28年,按照先知预言,我们的救主、主耶稣基督诞生于犹太地的伯利恒。”^④若这一说法属实,则基督教诞生的时间可以确切定位到公元14年,与屋大维去世,其养子提比略继位是同一年。

教会史学家大多都接受以耶稣基督的诞生作为基督教诞生的起点这一说法,根据《圣经》福音书的描述,耶稣出生于犹太的伯利恒,在加利利的拿撒勒成长。大约30岁时,在约旦河受洗于施洗者约翰,并在此之后开始宣扬天国的福音。约公元29年,耶稣在耶路撒冷被罗马总督逮捕,以妄称犹太人的王的罪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在死后的第3天复活,并展示了各种“神迹”,复活40天

^① Titus Flavius 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Books 14-15*, translated by Ralph Marcus, Allen Wikgren, Series: Loeb Classical Library, 1998, p.509.

^② 杨真:《基督教史纲》(上册),上海: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2页。

^③ [古罗马]塔西佗:《编年史》(上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5章14节。

^④ [古罗马]优西比乌:《教会史》,[美]梅尔英译注、瞿旭彤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4-35页。

后升天而去。耶稣的受难与复活使他的追随者形成了一个新的膜拜团体运动，他们所膜拜的对象不再是犹太教旧约圣经中的上帝，而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又复活的耶稣基督。正是因为他们对耶稣基督的崇拜，才被称之为基督徒，这一教派也被称为基督教。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对历史上是否有耶稣其人现在学界仍存有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相比起传说中耶稣被神化的形象，历史上的耶稣应只是犹太人中某个教派的领袖，是宗教出于扩大影响力的目的把各种传说集中到他的头上，以达到为其渲染上神秘色彩的目的。

到现代，随着考古学资料的丰富，对基督教的诞生又有了进一步认识。1947年在死海附近洞穴中发现一批纸草文献，研究表明，这是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犹太教中以西尼派的经卷。据纸草内容得知，以西尼派成员多由农民和牧民组成，有着严格的组织形式并虔守犹太教律法，他们把犹太人复兴的希望，寄托在“救世主”降临上。以西尼派在教义上与早期基督教颇为相近。公元四世纪基督教主教埃庇法尼乌斯曾提到，早在公元前，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就有一个犹太教派别称为拿撒勒派，他们和以西尼派使用同样的经书，同样信仰弥赛亚的拯救和神的统治即将降临。有学者认为，拿撒勒派可能是以西尼派的一个支派，并很可能就是基督教的雏型。^①

由此可见，基督教在诞生之初与犹太教之间存在着复杂的渊源关系，据《新约》记载，早期发展基督教的大多是希腊化了的犹太人，如施洗者约翰、使徒保罗等，而且在基督教的早期传播中，犹太教圣经仍然是他们依据的主要经典。基督教作为犹太教的一个支派，同时也是对犹太教的继承与革新，其发端于公元1世纪上半叶，恰逢古罗马处于国家转型的帝国早期阶段，人民群众中普遍存在价值观剧变、信仰缺失等问题，迫切期待一个强而有力的精神支柱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基督教开始与罗马帝国中的其他文化产生碰撞，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内涵，也逐渐从犹太教中脱离。

二、帝国早期的宗教并立现象与基督教的“异端”地位

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产生和发展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罗马帝国早

^① [英]阿契鲍德·罗伯逊：《基督教的起源》，宋桂煌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77-96页。

期，上层贵族与底层民众之间巨大的物质条件差距，除了造成阶级矛盾的激化，还导致了不同阶层在信仰上的分歧，罗马多神教中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官方宗教和代表下层群众利益的民间信仰逐渐分离开来。但正如前文提到的，该时期的官方宗教空有死板沉闷的仪式而缺乏内在精神，民间信仰又在帝王崇拜的影响下逐渐失去活力。最终，上层贵族与底层民众之间在精神领域彻底划清界限，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的贵族和知识分子试图通过希腊哲学来填补精神世界的空缺；对下层群众而言，来自东方形形色色的宗教密仪显然更容易被接受，也更符合他们的精神需求。

这一时期，埃及的伊西斯崇拜、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和密特拉教、叙利亚的大母神库柏勒，都在罗马帝国境内获得了相当数量的支持者。或许是得益于罗马官方长期奉行的宗教宽容政策，一些东方异教甚至能够影响到罗马的统治阶层，在卡里古拉当政时期，就正式准许建立伊西斯神庙，并在罗马境内举行隆重的圣母庆典。^①犹太教虽然受限于教义，几乎不接纳犹太人之外的民族信教，但罗马人在公元6年设立犹太行省后，允许犹太人实行内部自治。直到公元136年被哈德良驱逐之前，犹太教在帝国东部的叙利亚、犹太等行省内都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转型时期精神信仰方面的真空阶段，和宗教宽容政策共同形成了罗马帝国早期特有的宗教并立现象。

这些从东方传来的宗教派别与罗马本土的宗教在教义和内涵上大相径庭，因其产生的社会政治土壤不同，充斥当中的是神秘主义和彼岸赏罚等观念，与质朴、功利的罗马式宗教大异其趣。^②因此，尽管罗马人并不排斥外来宗教在帝国境内广纳信徒，却也没有完全接纳这些各具特色的宗教派别，在名义上，罗马多神教仍占据着国家宗教的地位，所有罗马帝国境内的居民也仍有义务参与罗马传统的祭祀仪式和庆典活动。除了少数被官方吸收进罗马多神教仪式中的神祇，大多数来自东方的宗教派别都被冠以“东方异教”的称谓，作为与国家宗教相区别的“异端”存在。它们在遵从罗马法律且不违背传统道德的前提下，被默许在境内传播。而对于那些与罗马的政治、法律发生冲突的异教，统治者则会毫不留情地予以镇压。例如在高卢省，罗马皇帝提比略和克劳迪曾经以消灭人祭的名义，彻底消灭

^① 李婧：《伊西斯神秘教研究》，硕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2009年。

^② [苏联]谢·亚·托卡列夫：《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魏庆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94页。

了掌握在督伊德僧侣手中的权利。^①

作为在帝国东部诞生的众多教派之一，早期基督教在宗教林立的大背景下，自然而然的被帝国统治者视为又一支“东方异教”。不过相比于其他教派，早期基督教在宗教地位上又具有独特的复杂性。

首先，基督教曾作为犹太教的一个分支派系，不仅大量继承了犹太教的宗教思想，根据《新约》的记载，被基督教尊为圣贤的早期基督徒，如施洗者约翰、使徒保罗本身就是希腊化的犹太人。虽然基督教继承并发展了犹太教的宗教思想，可是在基本教义和宗教行为上又存在着巨大差异，尤其是在“弥撒亚”观念和传教方式上的分歧，使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这就导致了相比其他符合犹太主流教义的支系，更具有普世性的基督教反而是不折不扣的“异端”。其次，在基督教开始步入独立发展阶段后，势必会与其他教派产生交流和碰撞，而由于从犹太教继承得到了一神信仰原则，基督教与当时普遍流行多神信仰和偶像崇拜的东部其他教派显得格格不入。随着基督教在帝国东部的传播与扩散，一神信仰与多神信仰之间的根本矛盾也就在所难免。基督教坚持对上帝耶和华的一神信仰，就意味着否认了其他宗教派别存在的合理性，这相当于在宗教林立的文化环境中把自己推向了其他教派的对立面，因此，基督徒在罗马帝国东部往往受到非官方的排挤与迫害。

而在罗马统治阶层的视野中，早期基督教则并未引起过多关注。当巴勒斯坦的地方总督把耶稣复生的事迹呈送给皇帝提比略时，提比略本人没有过问，只是将报告简单的转交给元老院处理，而元老院则以“未经元老院表决与裁定，任何人都不可被罗马人当做神明”^②这一理由否决了基督神迹的真实性。虽然罗马官方拒绝承认耶稣基督的神祇地位，但仍把基督的追随者们当作是巴勒斯坦地区犹太教的一个分支。出于维系叙利亚等行省稳定的考虑，罗马人对基督教采取了与犹太教相似的宽容政策，没有过多干涉早期基督教的传教活动。但也正是由于早期基督教与犹太教有着诸多相似之处，罗马统治者并不能很好的对两者加以区分，以至于基督徒往往会在针对犹太人的迫害活动中遭受无妄之灾。其中，最著名的是公元64年尼禄试图将发生在罗马城的大火归咎于犹太人闹事，而不加区别的

^① 王晓朝：《罗马帝国文化转型论》，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版，第104页。

^② [古罗马]优西比乌斯：《教会史》，[美]梅尔英译注、瞿旭彤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67页。

对罗马城内所有信仰基督的人实施迫害。此次宗教迫害在后世教会史学家的记载中被冠以“督教历史上的十大迫害之一”、“罗马帝国对基督徒的第一次公开迫害”等称谓，不过真实情况是，这场迫害的时间相当短暂，范围也仅限于罗马城内，甚至迫害的的动机都只是出于栽赃嫁祸和对基督徒的误解。

由此可见，基督教自诞生后，凭借对犹太教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帝国东部建立了一定的群众基础。但此时基督教的传播并未比其他“东方异教”展现出更多优势，在帝国西部的影响力也十分有限，只被罗马帝国视为与罗马多神教相对立的“异端”之一，时而还会受到来自其他教派和民间势力的排挤与迫害。而在辨识度方面，由于早期基督教在教义上还未能彻底摆脱犹太教的影响，以至于罗马人无法很好的区别两者间的异同，这既为初诞的基督教赢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却也遭受了些许不白之冤。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基督教对整个罗马帝国而言还只是一支人微言轻的“异端”教派。

第二章 “黄金时代”^①基督教的传播

公元96年，经历“四帝之年”^②（Year of the Four Emperors）短暂的内战，罗马帝国进入到安敦尼王朝（Nervan-Antonian dynasty）统治时期。安敦尼王朝由元老院贵族出身的涅尔瓦于公元96年开创，因罗马统治者安东尼·庇护（Antoninus Pius）而得名。这一时期的罗马帝国不仅在疆土面积上达到巅峰，经济、文化等领域也都步入了鼎盛时期，因此安敦尼王朝也被后世誉为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与此同时，基督教已在帝国内发展了数十余年，尽管曾遭到诸如尼禄、图密善等统治者的迫害，也仍未能摆脱相对于罗马国教而言的“异端”的地位，不过总体上仍保持着低调且稳定的发展状态。数十年的稳步发展后，基督教与犹太教之间的隔阂日渐加大，基督教的独立倾向日益明显。同时，乘着“黄金时代”中文化繁荣的东风，基督教的影响力也突破了东部疆界，开始在帝国全境快速传播。

第一节 基督教在帝国东部的迅速发展及向西传播

安敦尼王朝是罗马帝国时代最为强盛的王朝，这段时期罗马帝国在军事经济文化等多方面都达到了历朝的最高水平。按照历史进程划分，安敦尼王朝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涅尔瓦开朝至马可·奥勒留继位时，“五贤帝”^③治下的繁荣时期；第二阶段则是马可·奥勒留统治中后期至康茂德统治时的“三世纪危机”前夜。在安敦尼王朝的大部分时间里，基督教都受惠于帝国统治者的宗教宽容政策，得以在帝国境内自由传播。因此，这一时期也是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东部快速发展，并开始向西传播的关键阶段。

一、“黄金时代”基督教在帝国东部的发展

公元96年，涅尔瓦（Nerva）在弗拉维王朝末代皇帝图密善被刺后，经由元老院推举成为罗马帝国皇帝。由于涅尔瓦加冕时已是高龄元老，因此他的执政时

^① 安敦尼王朝前四位元首统治时期（公元96-161年）是罗马帝国历史上政治最稳定，经济发展最迅速的时期，后世将这一时期的繁荣称之为罗马的“黄金时代”。

^② 公元69年，仅一年时间内连续出现伽尔巴、奥托、维特利乌斯和韦斯帕芑四位皇帝，史称四帝之年。

^③ 公元96年-180年间统治罗马帝国的五位皇帝，分别为：涅尔瓦、图拉真、哈德良、安东尼·庇护和马可·奥勒留。

间只有不到两年，但他收养了战功显赫的行省总督图拉真（Traianus）作为自己的继承人，并由此为帝国开创了良好的皇位继承制度——养子继承制度。

后世对图拉真的记载，主要集中在他对罗马帝国版图扩张上取得的功绩。图拉真在位的 19 年间，利用一系列对外战争，将帝国的疆域拓展到了历朝之最。特别是对东方世界，不仅把罗马人的足迹延伸到波斯湾沿岸，从东方掠夺来的大量财富与奴隶也为公元二世纪罗马帝国奴隶制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图拉真统治时期的基督教尚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如果说“在公元 1 世纪结束前，基督教似乎就已经在整个东地中海世界站稳了脚跟，甚至在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取得了相当的发展”^①未免有些夸大其词，那么“在使徒时代，基督教就派出传教士前往帝国东部的诸多地区传教”^②显然更具有可信度。

按照奥利金提供的证据，基督徒人数与未皈依的庞大人群相比仍是微不足道的^③。不过根据优西比乌列出的主教更替年表记载，亚历山大里亚早在尼禄统治时期就诞生了第一位主教。^④或许由于传统宗教文化中有许多与基督教相契合之处，又或许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人社区早已为基督教传播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埃及行省是地中海东部以外最早受基督教传播影响的地区。这说明基督教在公元 2 世纪的传播不再局限于犹太行省一地，而是开始在帝国东部的其他地区进行传播，地方主教的诞生更是说明基督教已在这些地区取得一定程度的发展。

公元 117 年，哈德良（Hadrian）从养父图拉真手中接过了帝国最高统治者的权杖，在宗教政策上，哈德良基本延续了图拉真的宗教宽容态度，但不同于后者的积极扩张策略，哈德良选择转向全面收缩的防御性对外政策。在东部边境，哈德良与帕提亚王国缔结了和约，使罗马得以从漫长的战争中解脱；在西北边陲，他铸起了横贯不列颠的“长墙”，以防止凯尔特蛮族的骚扰；他甚至效仿小加图，放弃了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对岸的所有领土^⑤，因为帝国已无力承担防御这些领地的开销。这意味着，罗马帝国从图拉真时代“帝国无边界”的扩张策略退

^① [美]阿利斯特·E·麦格拉思：《基督教概论》，马树林、孙毅、李洪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231 页。

^② [古罗马]优西比乌：《教会史》，[美]梅尔英译注、瞿旭彤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年版，第 106 页。

^③ [英]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二卷，席代岳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 252 页。

^④ [古罗马]优西比乌：《教会史》，[美]梅尔英译注、瞿旭彤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年版，第 159 页。

^⑤ [古罗马]埃利乌斯·斯巴提亚努斯等：《罗马君王传》，谢品巍译，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 9 页。

回到奥古斯都时期“保持帝国天然边界”的传统之中。

哈德良的收缩政策是罗马帝国在领土扩张方面达到极限的标志，过度扩张使边境的领土难以得到有效控制，反而会增加帝国在财政和军事上的负担。显然，收缩政策是符合当时帝国利益的举措。同时，收缩政策带来的和平对帝国内部的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作用，帝国内部的商业贸易得以迅速发展，由东部前往首都的商人、奴隶和手工艺者、战争结束后返回西部的意大利退伍老兵和调换防区的职业军人，不仅极大的促进了罗马帝国东西部的贸易往来和人口流通，同时还将帝国东部的思想文化源源不断的带往西方。来自帝国东部的商人、奴隶，以及东方籍士兵，是将东方宗教引入帝国西部地区的重要媒介，而其中不少人便充当了基督教传教士的角色，成为了基督教由东向西传播的重要渠道。^①

二、基督教由帝国东部向西传播

公元2世纪，基督教在帝国东部取得了重大发展，并开始由帝国东部向西蔓延。基督教向帝国西部地区传播的具体表现，可以从西部地区基督徒人数的增长、信教地区的增加和信徒阶层的变化三个方面看出。

信教人数的增加可以直观地体现出基督教在帝国西部的传播，从《教会史》附录的主教更替年表中^②，便可对安敦尼王朝时信教人数的增长略窥一二。年表明确记载了自涅尔瓦至康茂德统治期间，叙利亚行省首府安提阿、埃及行省首府亚历山大里亚及罗马城所有的主教更替明细，正文中还对哈德良掌权时罗马城主教更替一事进行了补充。^③耶路撒冷以外的其他地区及帝国主要城市中稳定的主教更替意味着基督教在该区域建立了主教区，而形成主教区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该地区的信教人数达到一定数量。但主教区往往集中建立在行省的首府或人口稠密的商业城市中，并不能准确显示基督徒人数在帝国中具体的增长状况。因此，需要更准确的数据来佐证基督徒数量的增加。

受客观条件的限制，要对早期基督教的具体人数做准确计算十分困难，按照爱德华·吉本的推算，在遭到尼禄迫害时罗马城的基督徒人数尚未超过7000，

^① Franz Cumont, *The Oriental Religions in Roman Pagan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3, p.36.

^② [古罗马]优西比乌：《教会史》，[美]梅尔英译注、瞿旭彤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81页。

^③ [古罗马]优西比乌：《教会史》，[美]梅尔英译注、瞿旭彤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62页。

而到公元 3 世纪中叶，罗马教会统计的基督徒数量约为 5 万人，可能占罗马城总人口的百分之五。^①这个数据粗略地反映出，基督徒人数在公元 2 世纪应处于稳步增长的状态。不过罗马城作为帝国都城，具有重要的商业地位，人口也远多于帝国其他地区，其基督徒占城市人口比例也理应高于其他地区，因此如果以罗马城作为样本对帝国中的基督徒总人数进行推算则可能在数据上存在较大偏差。

现代学者利用数学建模对从诞生起至公元 4 世纪的基督徒人数做出了详细推断，估算出基督教诞生时的信徒人数约仅有 1000 人，而在公元 300 年之前保持着大约每年 3.42% 的增长率。^②根据数据计算出的结果是，罗马帝国进入到公元 3 世纪时，国内约存在 21 万 7 千余名基督徒，对比公元 1 世纪基督教初诞时的教徒数量，增长十分显著。在此基础上，考虑到经历第二次犹太战争后，作为基督教发源地的巴勒斯坦地区人口总量锐减，基督徒数量却仍能在安敦尼王朝时期持续增长，说明基督教的传播范围已不再局限于犹太行省，而是向多个地区扩散传播。再结合上文中吉本对罗马城基督徒数量的推算，可见基督教已明显有向帝国西部地区传播的迹象。

不过，公元 2 世纪的基督徒人数虽然有了大幅增长，但这只是纵向对比的结果。事实上，直到公元 200 年为止，基督徒占罗马帝国总人口的比例依然很低，大约只有 0.36%。^③若根据凯尔·哈珀在《帝国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The Fate of Rome: Climate, Disease, and the End of an Empire*）中对安东尼瘟疫造成的死亡率进行推算，公元二世纪中叶罗马帝国的总人口数约为 1650 万-1800 万。^④那么基督徒相对于在帝国民众中占主流的多神教信众而言，仍只不过是沧海一粟，诚如奥利金所说：信徒人数和未皈依的庞大人群相比起来，仍然是微不足道。^⑤

其次，除了信徒人数增加外，“黄金时代”还为罗马帝国西部信教地区的增多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图拉真积极拓展疆土的背后，是为服务军事行动而修筑的道路系统、邮政和信使系统。在哈德良的防御性政策下，这些交通系统为帝国内

^① [英]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席代岳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 248 页。

^② [美]罗德尼·斯塔克：《基督教的兴起——一个社会学家对历史的再思》，黄剑波、高民贵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版，第 6-7 页。

^③ [美]罗德尼·斯塔克：《基督教的兴起——一个社会学家对历史的再思》，黄剑波、高民贵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版，第 8 页。

^④ Kyle Harper: *The Fate of Rome: Climate, Disease, and the End of an Empi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p.124.

^⑤ [英]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二卷，席代岳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 252 页。

部的人口流通带来了巨大便利。同时，稳定的政治环境及奴隶制经济带来的高度繁荣，以及西部行省的罗马化进程，都极大促进了帝国东西部行省之间的文化交流。

根据现有资料显示，在公元2至3世纪之间，许多西部行省都存在基督教布道的痕迹，其中不乏西班牙、不列颠尼亚这类帝国的边陲地区。“早期基督教传教事工的主流并不是向安提阿的东部推进，而是向西推进。使徒保罗已经开辟了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路线，保罗的事工为未来的传教开辟了道路。”^①公元2世纪哈德良停止对外扩张的步伐后，非洲行省的第七杰米那军团（the VII Gemina legion）老兵和西班牙辅军老兵从毛里塔尼亚（Mauretania）退伍，他们将基督教介绍到故土，这一事实也有出土铭文作证。^②这表明基督教在公元2世纪就已由退伍老兵通过海路传播至西班牙行省，只不过，直到公元2世纪末期，当地罗马教堂使用的《圣经》和其他神学文献仍是用希腊语，而不是拉丁语书写的。^③由此可见，该时期基督教在西班牙行省的发展进程仍十分缓慢。

不列颠尼亚对基督教传播最早的记载来自德尔图良（Tertullianus），他认为2世纪末罗马虽然还未完全占领不列颠岛，但基督教已经传入其部分地区。^④而1978年，在切斯特考古发现的属于公元3世纪时的基督徒窖藏，其中有18块刻有十字架的还愿匾^⑤，则足以证明最迟至公元3世纪时基督教已确实传入了不列颠尼亚。

大量的证据表明，基督教在安敦尼王朝时期开始向帝国西部地区扩散传播，但仍需看到的是，即使帝国西部行省经历了“黄金时代”的快速发展，在经济、人口数量、文化水平上依然落后于东部地区，特别是一些西部边陲地带，尚处于氏族部落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阶段。公元2世纪基督教在帝国西部的传播，往往只限于人口流通较频繁的商业城市或人口基数较大的行省首府，难以深入到行省的内部腹地。而且，由于该时期基督教传播还需伴随西部行省的罗马化进程，即使是在文化上与罗马人十分接近的高卢，其发展速度较之帝国东部也相当缓慢。无

^① [美]布鲁斯·雪莱：《基督教会史》，刘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0页。

^② 尚德君、官秀华：《罗马帝国早期西班牙行省宗教崇拜罗马化刍议》，《古代文明》2014年第8卷第3期。

^③ D. Kyrata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Early Christian Communitie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87, p.169.

^④ Henry Chadwick: *Not angles, but Anglicans: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the British Isles*, Norfolk: Canterbury Press Norwich, 1996.

^⑤ 苏静：《基督教在英国传播的最初阶段》，《史志学刊》2006年第1期。

怪乎吉本如此评价到：“高卢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整个马可·安东尼统治时期，只能在里昂和维埃纳，见到人口不多还能联合在一起的会众。甚至迟至德西乌斯时代，仅在阿尔勒、纳博讷、图卢兹、利摩日、克莱蒙、图尔和巴黎等少数城市，存在零散而由少数虔诚教徒维持的教会。”^①

第三个方面，基督教与犹太教的一大区别之处，是基督教倡导对所有民众开放，不分民族、性别、阶级，所有人均可加入基督教。也正是因此早期基督教被安提阿的主教依格纳提乌斯（Ignatius）使用“大公”（katholikós）一词来形容。^②虽然早期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受众群体主要是奴隶和底层民众，不过它也对中上层人士保持了开放态度。进入安敦尼王朝后，基督徒的阶级和身份构成也随着教会的发展产生了变化。

基督教最初受到底层民众的青睐，得益于其宣扬教徒之间平等的普世观念和信仰得救的心灵慰藉。这种平等精神，对于罗马帝国统治下受奴役、压迫、剥削、歧视的奴隶和被释奴隶，穷人和无权者，具有巨大的吸引力。^③到公元2世纪中叶，这种吸引力不再局限于社会底层，对东方哲学思潮愈发失望的知识分子中，也开始有人对基督教信仰产生兴趣。著有《护教篇》的护教士查士丁便士其中的典型例子。“他渴望真正的哲学，这显然意味着一条通往对上帝的肯定的捷径，通往幸福的正确道路，以及各种各样的逻辑推理。在他的渴望中，他首先从禁欲主义者那里寻求智慧；继而是毕达哥拉斯学派；随后转向柏拉图学派的人。最后，他在海边散步时遇到了一个上了年纪的基督徒，经他的劝说，他才懂得了真正的哲学。通过探究，他加入了早期基督教。”^④

知识分子的介入，极大的推动了基督教的传播速度，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影响到统治者对基督教的态度。查士丁就曾上书安东尼·庇护（Antoninus Pius）和罗马元老院，为信仰申辩，并最终使皇帝向发生宗教迫害的亚细亚行省下达敕令。^⑤同时，知识分子教徒本身就是很好的传教士，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社会影响力也远非奴隶和一般民众所能比拟，甚至还能为基督教信仰增添一丝哲学色

^① [英]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二卷，席代岳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49页。

^② 张庆熊：《通往罗马路上的文化交流和融合——解读早期基督教会从迫害的宗教到成为“国教”的历史》，《复旦学报》2017年第6期。

^③ 李永斌：《论基督教的产生》，硕士学位论文，曲阜师范大学，2007年。

^④ Ramsay MacMullen: *Christianizing the Roman Empire(A.D.100-40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⑤ [古罗马]优西比乌：《教会史》，[美]梅尔英译注、瞿旭彤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71-173页。

彩，以提高基督教在公众心中的形象。有了知识分子的助力，基督教信仰伴随着帝国西部行省的罗马化进程得以快速传播。

除知识分子外，公元2世纪时，基督教的影响力还渗透到了罗马帝国的中上层社会，最早受到影响的是地方精英和贵族。早在弗拉维王朝至图拉真时期，地方精英阶层就尝试引入来自东方的古老信仰与当地的公民共同发展，以作为他们实现获得权力和声望的手段。^①基督教此时便成为了不少地方显贵的选择，这种现象在东部行省尤为明显，虽然愿意切身体行教义的人终究是少数，但他们大多乐于资助与教会发展相关的事业。随后，一小部分身居罗马城的骑士元老以及皇帝身边的宠臣也在这一时期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他们选择皈依的理由或许并非像底层居民那样简单地追求平等精神，而是出于更现实的需要或更深层次的精神寄托。^②这部分人对基督教传播的作用未必赶得上知识分子们，甚至还不得不小心掩饰其基督徒身份，但他们往往可以直接影响到统治者对基督教的态度。例如康茂德统治时期，由于皇帝受到宠妃马西娅（Marcia）的影响，基督徒度过了一段和平安宁的时期。^③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基督教在安敦尼王朝的传播十分迅速，影响力也有了较大提升，却并未改变其“异端”的地位。无论对基督教传播的态度如何，安敦尼王朝所有的统治者都仍是罗马多神教的忠实支持者。延续了图拉真宗教宽容政策的哈德良，对罗马神关怀备至而鄙视一切外邦信仰；^④同样秉持宽容原则且性情温和的安东尼·庇护除非本人生病，否则从不通过代理人举办奉献祭祀仪式；^⑤哪怕是停止了对基督徒迫害的康茂德，也十分热衷于罗马城的各种节日祭祀和赛会庆典，在其荒淫统治下更是把帝王崇拜发挥的淋漓尽致。因此，即便基督教在公元二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曾获得了统治者的默许得以在帝国境内传播，一旦出于政治问题考量或转移内部矛盾等其他方面的需要，作为“异端”的基督教就会立刻遭受到严重打压。

^① Douglas R. Edwards: *Religion and Power: Pagans, Jews, and Christians in the Greek Ea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76.

^② [美]罗德尼·斯塔克：《基督教的兴起——一个社会学家对历史的再思》，黄剑波、高民贵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2-44页。

^③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the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Vol 1)*,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0.

^④ [古罗马]埃利乌斯·斯巴提亚努斯等：《罗马君王传》，谢品巍译，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1页。

^⑤ [古罗马]埃利乌斯·斯巴提亚努斯等：《罗马君王传》，谢品巍译，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8页。

第二节 公元 2 世纪罗马统治者对基督教传播的态度

公元 2 世纪，从“五贤帝”治下的极度繁荣，到马可·奥勒留父子统治时期的内忧外患，罗马帝国经历了由盛转衰的过程。帝国国力的盛衰使罗马统治者采取了不同的政治经济政策，如果说政治经济战略对基督教的影响是间接性的，那么罗马统治者的宗教政策则能够对基督教传播发挥更为直接的作用，甚至会直接左右基督教的发展趋势。而安敦尼王朝时期罗马统治者的宗教政策，则可以直接反映出统治者对基督教传播的态度。

一、安敦尼王朝早期统治者对基督教传播的态度

总的来说，即使偶有针对基督徒的迫害行为发生，马可·奥勒留以前的罗马统治者对基督教传播的态度还是默许的。在图拉真皇帝与小亚细亚行省总督小普林尼（Gaius Plinius）的书信往来中，可以看到安敦尼王朝早期罗马统治者对基督徒及基督教会所采取的基本原则：“如果，他们（指基督徒）被带到你的面前，而指控又是确实的，他们就必须受到惩罚。但是，在那些否认自己是基督徒的案例中，必须让他们清楚地知道，并不是向我们的神灵献祭的行为，而是因为他们的悔改，我们既往不咎，使他们受到宽恕。不应该让匿名的小册子在这些指控中起到任何的作用。这些小册子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它们是违背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的。”^①哈德良统治时期，对基督徒的宽容原则得以延续，在给亚细亚总督范达努斯的书面答复中，哈德良同样对基督徒采取温和态度：基督徒的宗教虽然非法，但不得以非法手段搜捕基督徒。^②统治者的怀柔态度，为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迅速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不过在哈德良统治晚期，发生了对基督教发展具有较大影响的历史事件——犹太战争。公元 131 年，耶路撒冷爆发了大规模的犹太人起义，随后发展为罗马人与犹太人之间的第二次犹太战争。战争起因是由于哈德良在对犹太行省进行巡视后，颁布了禁止犹太教徒举行割礼，并要在耶路撒冷修建朱庇特神庙。这引发了犹太人的强烈不满，并最终导致起义爆发。公元 135 年，罗马人攻陷了犹太起义者最后的据点贝塔尔，起义军首领被杀，犹太地的犹太人要么遇难，要么为奴，

^① Pliny the Young, *Letters and Panegyricus I, Books 1-7*,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97.

^② [古罗马]优西比乌：《教会史》，[美]梅尔英译注、瞿旭彤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年版，第 203 页。

剩下的极少数也不得靠近耶路撒冷。^①至此，犹太人永远的赶出了耶路撒冷故地，被迫开始了“大流散”的生活方式。

第二次犹太战争对基督教传播的影响是多重的，一方面，犹太人彻底逐出耶路撒冷，这使基督教得以在帝国东部摆脱与犹太教的竞争关系，并从犹太教的“异端”分支身份中解脱出来，步入独立发展的道路。另一方面，犹太战争爆发的起因是哈德良试图在犹太行省推行希腊化政策而引发的民族矛盾，虽然结局以罗马人的胜利而告终，但试图利用政策手段缓和当地民族矛盾、巩固帝国在东部行省统治的目的却宣告破产。民族矛盾激化势必会对基督教在东部地区的传播产生不利影响，而罗马统治阶层由此产生对犹太人的仇视情绪也在一定程度上波及基督徒，这又为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传播蒙上了阴影。

安东尼·庇护作为哈德良的养子兼继承人，以温和仁慈的性格、高尚的品格和现存史料记载的稀缺而著称。在仅有的资料中可以得知，安东尼基本继承了哈德良的对外政策，大力发展国内经济，注重对行省的监督和管理。在安东尼治下，罗马帝国达到了“黄金时代”的最鼎盛时期，安敦尼王朝也因他而得名。

在宗教事务上，安东尼·庇护同样延续了前任统治者的宽容政策。加之他为人称赞的温和性格，即使在经历了犹太战争这样的激烈冲突后，他仍允许罗马帝国境内的犹太人恢复曾经的古老特权。“残留的犹太人虽不得进入耶路撒冷，却可在意大利的行省和城市建立居留点，并获得罗马法令所规定的自由，享有市民荣誉，且无须负担社会公职义务”^②。对异教的宽容也同样影响到基督教，通过皇帝对亚细亚行省发生迫害基督徒事件而向地方议会发出的敕令^③可以看出，公元二世纪前中期的罗马统治者基本都对基督教传播保持了较理智的中立态度。

二、马可·奥勒留父子对基督教传播的态度转变及原因

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与其子康茂德（Commodus）统治的时期，被认为是安敦尼王朝晚期，不同于王朝前期的欣欣向荣，此时罗马帝国已经逐渐从“黄金时代”的活力中衰退。对外扩张停止后，奴隶来源的枯竭导致奴隶制生

^① Anthony Everitt: *Hadrian and the Triumph of Rome*,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0, p.321.

^② [英]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二卷，席代岳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64页。

^③ [古罗马]优西比乌：《教会史》，[美]梅尔英译注、瞿旭彤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73页。

产方式的局限性开始暴露，国家经济陷入萧条之中；帝国边境也遭遇到周边少数民族的侵扰，时而发生军事冲突，日耳曼人向罗马帝国境内的大规模迁徙活动也从这一时期开始^①；曾被繁荣盛世所掩盖的诸多社会问题再度激化，民族矛盾、文化冲突、阶级矛盾集中爆发，罗马帝国踏入了“三世纪危机”的前夜。

“五贤帝”中的最后一位，被称为哲学家皇帝的马可·奥勒留统治时，对基督教传播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尽管奥勒留是一位斯多葛派哲人，后世对他的德行也称赞有加，但他并未延续前几任皇帝对基督教的宽容态度，而采取了较严厉的政策对待基督徒，在他统治期间，帝国东部的亚细亚行省还爆发了载入教会史册的大规模迫害。发生宗教迫害并不总是因为单纯的宗教信仰原因，而常常是出于政治及其他原因。^②马可·奥勒留统治时期出现如此严重的宗教迫害事件，宗教信仰方面的冲突固然起到了关键影响，而其他方面的因素也不应被轻易忽视。

首先是奴隶制衰落导致的经济问题，罗马帝国早期的繁荣十分依赖于奴隶制庄园经济的发展，无论农业还是工商业，使用奴隶作为主要劳动力的现象都是普遍的。而当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难以为继时，必然会引发帝国经济的衰退。可以说，导致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奴隶制的衰落。^③哈德良统治时期，罗马帝国停止了大规模的对外征服活动，战争停止不仅意味着罗马帝国的版图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到达了极限，还造成了奴隶来源的枯竭，这是导致奴隶制经济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奴隶制已不再有利，因此也就灭亡。但是垂死的奴隶制却留下了它那有毒的刺，即鄙视自由民的生产劳动。在这里罗马世界就陷入了绝境：奴隶制在经济上已经不可能了，而自由民的劳动却在道德上受鄙视。前者是已经不能再作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后者是还不能成为这种形式。只有一次彻底的革命才能摆脱这种绝境。”^④诚如恩格斯所言，奴隶制衰落在生产方式上将罗马帝国推入了绝境，也是引发其他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源。

其次是政治动荡导致统治者对“异端”教派的态度转变。公元175年，东部行省的总督卡西乌斯趁奥勒留征讨萨尔玛提亚人时，在叙利亚行省发动叛乱。叛

^① 杨共乐：《罗马史纲要》，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323页。

^② John G.Cook, *Roman Attitudes Toward the Christians: From Claudius to Hadrian*,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10.

^③ 杨共乐：《罗马史纲要》，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90页。

^④ [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家庭、所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9-150页。

乱虽被快速镇压，但皇位挑战者的出现实实在在的威胁到了统治者本身，也反映出当时政局的不稳定。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马可·奥勒留非常注重维护罗马多神教的国教地位，特别注重传统的祭祀仪式，而且他本人在童年时代就是萨利祭祀团的一员，并在此期间获得了执掌大权的征兆。^①对于来自东方的异教势力，奥勒留普遍采取了打压和限制态度，考虑到皇帝本人的德行，或许东部行省发生对基督徒如此大规模的迫害并非出自他本意，但在他统治期间，基督教信仰确实被定义为非法，对基督徒实施较为严厉的政策^②也是事实。

最后是民族矛盾在宗教问题上的反映。罗马帝国是一个由多民族构成的国家，不同民族往往具有不同的信仰，无论罗马采取如何宽容的宗教政策，宗教问题仍极易成为民族矛盾爆发的宣泄口。而基督教特立独行的一神信仰，无论是与罗马的国家宗教还是与其他民族的多神信仰宗教都存在严重分歧，加上基督徒拒绝履行诸如纳税、服兵役和参与公共祭祀仪式等帝国公民的义务，导致其经常成为地方民族矛盾爆发时的众矢之的，尤其是希腊人和犹太人对基督徒充满了敌意和唾弃。^③因此，当行省由于各种原因出现暴动时，地方官员一般都会顺应民意，牺牲部分基督徒来安抚地方民众。^④

马可·奥勒留死后，其子康茂德继位，这打破了自涅尔瓦时代开始的养子继承制。不同于奥勒留的高压政策，康茂德对基督教的态度颇为宽容，在他执政期间，不仅帝国东部的迫害得到缓解，基督教传播的整体状况也有所改善。不过，康茂德作为安敦尼王朝的末代皇帝，大多数历史记载都将他描绘成荒诞的暴君，而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也在他荒淫的统治下走向了终结。

第三节 “日渐独立”——基督教与犹太教划清界线

“2世纪基督教开始形成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基督教的有识之士意识到他们要跟犹太根源划清界限。”^⑤自使徒保罗起，基督教与犹太教之间的界线就已经开始形成，历代护教士也一直努力理清基督教与犹太教之间的边界，但直到公元

^① [古罗马]埃利乌斯·斯巴提亚努斯等：《罗马君王传》，谢品巍译，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3页。

^② 杨共乐：《罗马史纲要》，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314页。

^③ [古罗马]优西比乌：《教会史》，[美]梅尔英译注、瞿旭彤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78页。

^④ [英]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二卷，席代岳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87页。

^⑤ Emily J. Hunt: *Christian in the Second Centu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5.

2 世纪中期，基督教才真正意义上做到从犹太教中脱离，步入独立发展的阶段。

基督教在公元 2 世纪表现出日渐独立的原因可以从内外两方面概括。外因方面，在哈德良统治期间爆发的第二次犹太战争，将犹太人从耶路撒冷故地驱逐了出去，犹太民族被迫开启了大流散的生活方式。虽然犹太战争对早期基督教的发展也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在客观上还是将基督教从巴勒斯坦地区乃至整个帝国东部与犹太教的竞争关系中解脱出来。犹太民族遭到驱逐后，帝国统治者也逐渐意识到基督教是一个独立存在的教派，不再将他简单地归类为犹太教的一个分支。内因方面，安条克教会的第二任主教伊格纳提乌斯在殉道过程中，通过书信形式对基督教教义与犹太教经典《旧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明确界定。他认为“对‘摩西律法’要肯定，这是‘矫正’、调和的一步；而在此基础上他明确地反对犹太教对基督教的攻击，号召基督教徒要突出自身的独立性，防止犹太模式的渗透，这是建立的一步。”^①伊格纳提乌斯迈出了基督教独立的关键一步，他提出的原则基本被后来的护教士们所继承，查士丁、德尔图良等人在著作中都明确采纳了伊格纳提乌斯的原则，尤其是德尔图良被收录在教会史经典《尼西亚的神父》(*The Ante-Nicene Fathers*)中的篇章《对犹太人的回答》(*An Answer to Jews*)贯彻了《旧约》中的“摩西十诫”“是上帝颁布给所有民族的律法”这一原则^②，德尔图良对伊格纳提乌斯原则的重申使其成为后世基督徒衡量基督教与犹太教关系的基础准则。

当然，无论是伊格纳提乌斯还是德尔图良、查士丁、爱任纽等人，他们在自身所属的时代背景下对基督教独立性的追求，仍无法帮助教会在短时间内彻底摆脱犹太教的影响，形成自成一体的宗教体系。因为基督教起源自犹太教，两者在宗教思想上有许多共同之处，而且基督教自诞生起，在时间与空间上都处于复杂且矛盾的状态之中：在时间上，基督教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却在思想体系和组织形式上，与其母体犹太教有着难以在短时间内区分开来的交集，两者属于既传承又排斥的关系；在空间上，基督教产生于东地中海这个文化和民族交汇的“十字路口”，不同文化、民族形成的思想体系、宗教派别相互碰撞。面对如此混乱的生存环境，在教义上特立独行的基督教很容易面临被其他教派共同排斥的灭顶之灾，因此新生教会不得不从犹太教寻求传承和庇护，为发展自身争取时间。时间

^① 张立可：《二世纪基督教教义的独立与教派分化》，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5 年。

^② Tertullian: *An Answer to Jews, Chapter 2, Pagan, From The Ante-Nicene Fathers, Vol. 3, ed., by Alexander Roberts, James Donaldson, Philip Schaff, Hendrickson Publishers, 1996.*

与空间上的复杂性，成为基督教在诞生初期经常被误认为是犹太教中的一个“异端”分支的根本原因。

但无论如何，在公元2世纪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基督教与犹太教划清界线，仍是其避免受到犹太教母体过多影响，并延续自身发展的重要条件。更关键的是，基督教的日渐独立对其宗教地位的变化也产生了一定的作用。首先，第二次犹太战争之后，帝国上下对基督教有了全新的认知，不再把它简单地视为犹太教的一个“异端”分支，基督教从此摆脱了既是“东方异教”又是犹太教分支的双重“异端”身份，为往后的传播带来了有利因素。其次，日渐独立的基督教明确了自身的教义，能够在与其他东方异教的竞争过程中获得更多主动权。相比于犹太教狭隘的民族观，基督教本就以对所有民众开放的普世观而广纳信徒，但教会早期传播过程中受制于混乱的教义，不仅无法彰显出一神信仰独特的吸引力，还会因为与犹太教之间的关联而受到其他东方教派的掣肘。基督教明确了自身教义后，才逐渐从众多教派中脱颖而出，在帝国内不同群体中都收获了青睐。最后，基督教的日渐独立鼓舞了信徒的热情，尤其是明确的教义使护教士了解到自己应该为何种信仰而辩护。自安东尼·庇护时期的著名教士查士丁殉道起，大量的护教书和殉道者开始涌现，优西比乌在《教会史》中特别记载了发生在马可·奥勒留统治时期，高卢行省的基督教迫害中出现的大批殉道者。^①大量普通教徒殉道者的出现，说明基督教内开始出现殉道主义思想，而殉道主义增强了普通基督徒的委身信念，在基督教早期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不可低估。^②这种近乎于宗教狂热的殉道行为，对非基督徒产生了极大的心灵冲击，也引起了罗马统治者对基督教信仰的惊讶与恐惧。因此，进入公元3世纪后，罗马政府对基督教的迫害开始由孤立的、区域性的转变为长时间且全国范围的，这也坐实了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中的“异端”地位，侧面反映出基督教开始向主流信仰挑战者的身份发展。

虽然，相比公元1世纪，在安敦尼王朝时期基督教依然属于“异端”教派，其宗教地位总体上的变化并不显著，但日渐加强的独立倾向改变了基督教与犹太教之间复杂混乱的关系，对教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还解决了基督教长期以来教义不明确的问题，是推动基督教在“黄金时代”中传播的重要因

^① [古罗马]优西比乌：《教会史》，[美]梅尔英译注、瞿旭彤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06-218页。

^② 刘津瑜：《罗马史研究入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12页。

素之一。

第三章 “三世纪危机”时期基督教的发展

公元193年，安敦尼王朝末代皇帝康茂德被弑，安敦尼王朝宣告终结。罗马帝国再次经历短暂的内乱后，由出身非洲的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重新统一，进入塞维鲁王朝时期（The Severus Dynasty）。但这个依赖于军队支持的短命王朝，只不过是拉开了“三世纪危机”^①（Crisis of the Third Century）的序幕。“三世纪危机”是罗马帝国由于奴隶制经济衰落引起的全面危机，由于爆发时间主要在公元3世纪，因此而得名。“三世纪危机”期间，罗马帝国都面临着经济萧条、城镇凋敝、内战连绵的动荡局势，不过对基督教而言“三世纪危机”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帝国居民在社会动荡中愈发失去了对象征着国家权力的多神教的热忱，这为基督教笼络人心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另一方面，基督教在危机中的快速传播，威胁到了已摇摇欲坠的元首制，罗马统治者感受到这支“异端”教派对自身统治的威胁，开始通过行政手段加以针对，教会不得不面对来自统治阶层的新一轮迫害。

第一节 公元3世纪罗马统治者对基督教传播的态度

公元3世纪的罗马帝国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塞维鲁王朝统治时期、“三世纪危机”高潮时期和戴克里先的君主制时期。3世纪的罗马统治者与安敦尼王朝时期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的宗教政策整体上是连贯的，统治者对基督教传播的态度基本上保持稳定；前者则往往是出于自身意志肆意采取宗教政策，加之政治上的动荡，统治者在位时间普遍不长，导致基督教在不同阶段面临的传播条件大相径庭。

一、塞维鲁王朝统治者对基督教传播的态度

公元193年，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受到军队的拥立成为皇帝，开创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塞维鲁王朝。而实际上，直到公元197年，塞维鲁才击败了其他帝

^① 公元235-284年罗马帝国所面临的全面危机。由于奴隶制经济衰落，从公元3世纪开始，罗马帝国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农村枯竭、城市萧条、内战连绵，征服全面瘫痪，这种全面的混乱迹象史称“三世纪危机”。

位争夺者，真正实现帝国的统一。塞维鲁出身于非洲的阿非利加行省的骑士阶级家庭，起初塞维鲁并不是罗马元老院青睐的帝位候选人，不过他受到了自己麾下军团的拥立，并通过内战的方式击败了其他竞争者，最终加冕为皇帝。塞维鲁发迹于军旅，被前苏联学者科瓦略夫称为“第一个士兵皇帝”^①，他在成为罗马皇帝后对军队作出了较大改革，他重组了近卫军，还新建了3个军团，其中两个驻扎美索不达米亚，另一个军团则驻扎在意大利，归属近卫军长官管辖。^②塞维鲁依恃军队的力量夺取大权，因此格外重视对军队的控制，但在上一章节中曾提到，基督教经常以东方的士兵和退伍军人为媒介在帝国西部进行传播，这一现象在公元3世纪进一步加深，不少现役军团中都出现了信仰基督教的士兵。优西比乌在《教会史》中记载了一段塞维鲁王朝时期的士兵因同情基督教殉道者而皈依的事件^③，反映军队中基督徒士兵的出现。基督徒士兵有时会在军营中表现出不顾一切的宗教狂热行为，不仅影响了军纪，还会在军队中造成严重的离心倾向，这是塞维鲁所无法容忍的。因此，在塞维鲁统治期间，基督教和犹太教信仰被严令禁止。^④也正是在塞维鲁统治期间，亚历山大里亚爆发了惨烈的宗教迫害行为被列为教会的“十大迫害”之一。

公元211年，塞维鲁在远征不列颠的过程中病逝，其子卡拉卡拉（Caracalla）与盖塔（Geta）加冕为共治皇帝，不过两人之间很快就发生了兄弟阋墙，卡拉卡拉杀死了弟弟以巩固自己的皇位。卡拉卡拉统治期间，于公元212年颁布了安东尼努斯敕令（Constitutio Antoniniana），赋予罗马帝国境内所有的自由人罗马公民权。卡拉卡拉在位时间不长，除了颁布安东尼努斯敕令外鲜有政绩，但他继位后，塞维鲁统治时期对基督教的严厉禁令得到了缓解，而且相传卡拉卡拉的养母就是一位基督徒。^⑤

塞维鲁王朝作为一个依靠军队夺权建立的政权，历任皇帝多由军队拥立登基而非元老院选举任命，这是罗马帝国经“五帝之年”内乱造成的后遗症。因此，皇帝非常依赖军队的支持，一旦军队的需要未能得到满足，或皇帝试图削弱军队

^① [苏联]狄雅可夫、科瓦略夫：《世界古代史：古代罗马部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

^② Alan K. Bowma, Averil Cameron, Peter Garnsey,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Second Edition, Vol. X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③ [古罗马]优西比乌：《教会史》，[美]梅尔英译注、瞿旭彤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67-269页。

^④ [古罗马]埃利乌斯·斯巴提亚努斯等：《罗马君王传》，谢品巍译，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89页。

^⑤ 杨共乐：《罗马史纲要》，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314页。

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就很容易遭到杀身之祸。出于这个原因，塞维鲁王朝的皇帝普遍在位时间不长，卡拉卡拉在位仅6年便被近卫军所弑，随后继位的近卫军长官马克利努斯（Macrinus）只统治了不到1年，流有塞维鲁王室血统的埃利奥伽巴鲁斯（Elagabalus）和亚历山大·塞维鲁（Alexander Severus）分别只统治了4年和13年，塞维鲁王朝帝位的频繁更替反映了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在政局上的极度不稳定。

不过整体而言，塞维鲁王朝时期基督教都处于相对宽容的传播环境之中。埃利奥伽巴鲁斯虽然荒淫无道，但却试图把基督教的宗教仪式转移到帕拉丁山的神庙中，即使这么做是的目的是他妄想让埃利奥伽巴鲁斯神的祭祀可以饱览一切形式的宗教。^①亚历山大·塞维鲁更是允许了基督徒的存在^②，这说明塞维鲁王朝时期对基督教基本保持了接纳的态度，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统治时发生的迫害只是出于统治者个人意愿的昙花一现。

二、“三世纪危机”高潮中复杂多变的宗教形势

公元235年，塞维鲁王朝的末代皇帝亚历山大·塞维鲁在军队叛乱中被杀，“三世纪危机”在罗马帝国愈演愈烈，终于在塞维鲁王朝终结时达到了高潮。“三世纪危机”的高潮一直持续到公元284年戴克里先登基为止，在此期间，罗马帝国始终未能形成统一的王朝，地方行省总督、军团指挥官、元老阶层中的野心家纷纷加入到帝位的争夺中，帝位更替比公元3世纪初期更加频繁。公元235年至284年的50年间，通过各种方式取得皇帝尊号的人数多达60余位，而皇帝的平均在位时间却不到3年。需知，从屋大维建立元首制到安敦尼王朝结束，共治者在内罗马帝国总共出现了17为位皇帝，“三世纪危机”的乱象由此可见一斑。由于行省总督自立和受戍边军团拥立登基的现象增多，帝国经常陷入多个政权割据的局面，而元老院自塞维鲁军政府时期的打压起，越发失去左右政治局势的能力，这造成了政令难以在帝国中全面通行，朝令夕改的现象更是层出不穷。

“三世纪危机”高潮时期，罗马帝国的宗教形势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复杂性。复杂性一方面来源于政治局势动荡，帝位更替频繁；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统治者自

^① [古罗马]埃利乌斯·斯巴提亚努斯等：《罗马君王传》，谢品巍译，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77-278页。

^② [古罗马]埃利乌斯·斯巴提亚努斯等：《罗马君王传》，谢品巍译，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23页。

身对基督教反复无常的态度。在此期间的罗马统治者中，有些对基督教严令禁止并施加迫害：如马克西米努斯（Maximinus）可能是出于对前任皇帝的憎恨对基督教展开迫害；德西乌斯（Decius）是首个在罗马帝国全境范围内发动迫害基督教的皇帝，他认为罗马帝国的昔日繁荣依赖于人民信仰罗马国教，而近期灾难的降临正是因为有一批人不信仰罗马国教造成的，^①因此颁布敕令要求全国民众向神明献祭，有违者将被视作基督徒处以极刑；瓦莱里安（Valerian）在统治初期对教会比较宽容，然而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公元 257 年时他突然采取了迫害基督徒的政策。也有的皇帝对基督教采取了宽容友善的态度：如伽利埃努斯（Gallienus）不仅停止了其父瓦莱里安的迫害政策，还在罗马历史上第一次颁布宽容敕令归还教会财产；^②更有甚者，自立为帝的“阿拉伯人”菲利普（Philippus Arabs）相传是一位基督徒皇帝，虽然这一说法仍然存疑，不过他对基督教的友善态度和宽容政策是可以肯定的。除此之外，还有些统治者持模棱两可的态度：如加卢斯（Gallus）虽然驱逐了为其祷告的基督徒，但在亚历山大主教狄奥尼修斯的书信中又表示，在他治下对基督徒的迫害明显在逐渐减少^③；奥勒良（Aurelian）认为，在多神教神庙中寻求帮助要比在基督教教堂中更加可靠^④，不过他并不反对基督徒在帝国中活动。

帝位频繁更替导致的政治动荡削弱了自屋大维时期起就被历代帝王沿用的“帝王崇拜”，这对罗马多神教而言是沉重的打击。政局的不稳定还影响到罗马人对政府的信任，奥勒良统治期间，罗马城受到蛮族入侵的威胁，城中民众在慌乱之际竟妄图通过宗教献祭以求幸免^⑤，反映出人民对国家和统治者失去信心，只能依靠宗教聊以慰藉。除了政治方面，“三世纪危机”对经济的影响也尤为严重，奴隶制经济的衰落造成帝国整体经济环境的萧条，蛮族对边境的压力又加剧了民众在税收上的负担。始自塞维鲁王朝对军队的极尽谄媚，给军人的犒赏也水涨船高，皇帝不得不减少钱币中贵金属的含量以解决犒赏费用不足的问题。同样

^① [美] 威利斯顿·沃尔克：《基督教会史》，孙善玲、段琦、朱代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版，第 99 页。

^② [古罗马] 优西比乌：《教会史》，[美] 梅尔英译注、瞿旭彤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年版，第 372 页。

^③ [古罗马] 优西比乌：《教会史》，[美] 梅尔英译注、瞿旭彤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年版，第 328 页。

^④ [古罗马] 埃利乌斯·斯巴提亚努斯等：《罗马君王传》，谢品巍译，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 534 页。

^⑤ [古罗马] 埃利乌斯·斯巴提亚努斯等：《罗马君王传》，谢品巍译，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 532 页。

是重量为3.21克的银币，康茂德时期的含银量约为67%，等到3世纪初，卡拉卡拉发行的安敦尼币就只有50%的含银量了，而到了瓦莱里安执政时罗马“银币”的含银量更是急剧下滑到只剩下5%甚至是2%。^①货币贬值对3世纪不断恶化的通货膨胀可谓是雪上加霜，底层民众的生活水平逐渐降低到难以为继的程度。政治和经济上的危机为基督教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加之早期教会对底层民众的怜悯和庇护，使基督教被平民视作在动乱年代中的救星。公元3世纪后，随着基督教在帝国西部的传播，为了谋求更大的社会影响力，罗马的部分上层人士试图利用基督教的势力，贵族元老通过担任教职的方式开始参与到教会的管理中，这使基督教的性质在这一时期也逐渐产生了变化。

综上所述，“三世纪危机”高潮时期帝国宗教形势对基督教传播的影响难以被简单概括，虽然宗教形势在整体上朝着有利于基督教传播的方向发展，但基督教传播的范围越是扩张、影响力越是提升，受到各方面的阻力也就越大。不仅罗马统治者感受到基督教势力扩张的威胁而采取更加严厉的禁令，普通民众中对基督教持排斥态度者也不在少数。公元3世纪中期发生在亚历山大里亚的大规模宗教迫害甚至在德西乌斯下达敕令的前一年就已发生，起因是当地民众受到一位预言家的教唆。^②至3世纪末，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传播开始遇到瓶颈，教会也将面临有史以来最为严峻的考验。

三、戴克里先的统治与“大迫害”降临

公元284年，东部军队推举皇家卫队司令官戴克里先(Diocletianus)为皇帝，经历了为期1年的皇位争夺，戴克里先击败其他竞争者，“结束了军事无政府状态，以及短命皇帝血腥继位的历史”^③。戴克里先的统治被认为宣告了“三世纪危机”的结束，他本人更是被誉为“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④。

戴克里先夺得大统之后，对罗马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都进行了改革。在政治上，戴克里先推行君主制取代难以为继的元首制，他将自己视为“dominus”，

^① R.A.G.Carson: *The Reform of Aurelianus*, *Revue Numismatique Année*, 1965.

^② 优西比乌：《教会史》，[美]梅尔英译注、瞿旭彤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03页。

^③ Antonio Santosuosso: *Storming the Heavens: Soldiers, Emperors, and Civilians in the Roman Empir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2001, p.177-179.

^④ Theodor Mommsen: *A History of Rome under the Emperors*,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lare Krojzl,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53.

即“罗马的主人与统治者”，宣称其统治权来自诸神而非公民。同时，戴克里先任命马克西米安（Maximianus）为共治皇帝，授予其“奥古斯都”称号，还另外提拔伽勒里乌斯（Galerius）和君士坦提乌斯（Constantius）为“凯撒”，即奥古斯都的副手和接班人，形成所谓“四帝共治”制。在经济上，戴克里先为解决通货膨胀、生产凋敝和宫廷开支过大等问题，分别改革了币制和税制，并用敕令的方式对物价进行管控，试图缓解“三世纪危机”期间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现象。在军事上，戴克里先对军团进行了改制，重构了边防体系，削减近卫军人数。戴克里先的军事改革缓解了自塞维鲁王朝起不断加剧的军费冗余问题，并从根本上杜绝了近卫军对皇位的操控，但他的改革也造成罗马军队的蛮族化趋势愈发明显。

戴克里先的一系列改革，使罗马帝国慢慢走出了“三世纪危机”的深渊中，对外稳固了帝国边境的防线，免受周边势力的侵扰，对内促进帝国经济形式走向好转，暂时缓和了民族矛盾和政治动荡。但戴克里先改革既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导致“三世纪危机”的根本性问题：奴隶制经济崩溃，因此罗马帝国终究只是从危机之中得以喘息，并非是完全摆脱了危机带来的种种问题。此外，戴克里先为了加强皇权的统治，决心恢复罗马多神教信仰。他在自己的正式名中加入约维乌斯（Jovius）的名号，以告示民众自己与朱庇特的联系。^①而随着公元3世纪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快速传播，与罗马多神教在教义信仰上的巨大分歧也就注定了戴克里先与其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

公元3世纪末，戴克里先要求所有士兵和政府官员向罗马诸神祭祀，否则禁止在军队中服役或在官僚机构中任职。^②而这还是全面迫害基督徒的前奏，随后在公元303年，戴克里先下达了敕令，命令各地拆毁教堂，焚烧圣经，所有基督徒将失去原有的地位与身份，优西比乌将这一事件称之为基督教会史上的“大迫害”。“大迫害”是罗马帝国对基督教最后一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宗教迫害事件，“四帝共治”时期的四位统治者均在不同程度上投入到对基督教的迫害之中，遍布罗马帝国全境的残酷迫害持续了近十年。

“大迫害”在基督教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因为这是罗马帝国第一次将基督徒视为国家公敌身份施加迫害。虽然此前在德西乌斯时期也发生了对基督徒的大规模迫害，不过德西乌斯在位时间并不长，迫害持续时间也相对短暂。而“大

^① 张晓校：《戴克里先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5页。

^② Chris Scarre: *Chronicle of the Roman Emperors: the Reign-by-Reign Record of the Rulers of Imperial Rome*,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95, p.202.

迫害”不仅旷日弥久，对教会的打击力度也是前所未有的。戴克里先重点破坏了教会的组织形式，对各地教会的领袖，教会的主教、长老施以重刑，并剥夺了基督徒的法律权力，对不同阶层的信众实行无差别的迫害。迫害政策在短期内起到了显著的成效，部分教会上层开始屈服，罗马主教被迫到罗马神庙献祭，迦太基主教甚至还劝说教徒不要信仰基督教。^①

“大迫害”是罗马帝国统治者试图举全国之力从本根上消灭一个宗教的迫害事件，但即使如此也未能彻底扼杀基督教势力，随着公元311年伽勒里乌斯（Galerius）颁布宽容敕令，“大迫害”基本宣告结束。迫害不仅未使基督教一蹶不振，反而在公元313年的《米兰敕令》中，教会获得了合法地位，成为基督教史上的转折点。由此可见，到公元3世纪末期，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已发展到不容小觑的地步，以至于连罗马的统治者都无可奈何。

第二节 基督教在帝国西部的传播与教会组织的完善

如果说公元2世纪基督教尚处于由帝国东部向西传播的阶段，那么公元3世纪基督教就已实现在帝国西部广泛的传播。受到“三世纪危机”的影响，帝国西部爆发了剧烈的社会危机，这为基督教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早期基督教秉持信仰得救的观念，对生活在动荡年代中的罗马公民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同时，罗马教会的崛起对基督教在帝国西部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西部众多城市受基督教影响的日益加深，各个西部城市的教会与罗马教会之间逐渐形成了完善的教会层级结构。

一、基督教信仰在“三世纪危机”中的独特吸引力

基督教能够在罗马帝国顽强的发展，甚至在经历多次迫害之后仍然屹立不倒的原因，可以总结为五个方面：1. 基督徒的狂热的宗教信仰和选民意识；2. 基督教的天国理想的巨大精神感召力；3. 原始基督教会所标榜的驱邪祈福的神奇法力；4. 基督徒所具有的崇高道德和殉道精神；5. 早期教会内部的团结、纪律和平等制度。^②这五大原因，也成为基督教在“三世纪危机”中对陷入困境的罗马公民产

^① 张晓校：《戴克里先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15页。

^② 赵林：《基督教与罗马帝国的文化张力》，《学术月刊》2015年第47卷第4期。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455101333023011040>